

冷戰 · 離散 · 文人： 《今日世界》中的張愛玲¹

單德興²

摘要：張愛玲（1920-1995）曾三次停留香港，其中以第二次（1952 年 7 月至 1955 年 5 月）較為特殊。時值冷戰時期，美方自詡為自由世界領袖，全力圍堵蘇聯國際共產主義的擴張，雙方除了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對峙與交鋒之外，呈現軟實力的文化外交也是重要策略。香港美國新聞處在中文世界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旗下的今日世界出版社以翻譯美國的代表作品為主，力求彰顯美國的自由、民主與開放，而《今日世界》雜誌則試圖以通俗內容與新知報導，來達到宣傳的目標，成為當時中文世界最風行的刊物。就張愛玲而言，出版社負責張愛玲譯作的出版與發行，強調的是「譯者張愛玲」；《今日世界》雜誌除了連載張愛玲的反共小說《秧歌》，也刊載有關其譯作與小說的書評，以及她的活動報導，著重的是「作家張愛玲」。本文有別於一般奠基於張愛玲作品單行本的研究，而

¹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美國的文明化任務及其轉化：《今日世界》於冷戰時期華文世界所扮演的角色與影響」（編號 105-2410-H-001-069-MY3）之部分成果。撰寫過程中承蒙張力行小姐協助蒐集、整理資料，比對不同版本並製表，陳櫻文小姐協助館際合作，後續工作由趙麗婷與陳雪美小姐協助。初稿承蒙鄭樹森、高全之、李有成、王梅香、王鈺婷、張錦忠、王智明諸位專家學者過目並提供意見，謹此致謝。文中任何不妥之處，概由作者負責。

²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將她連結到冷戰時期香港的歷史與文化脈絡，尤其美新處的文化生產機制，聚焦於《今日世界》所呈現的張愛玲形象，運用歷史化與脈絡化的研究取向，為已蔚為顯學的張愛玲研究提供另類視角下的一塊拼圖。

關鍵詞：張愛玲，《今日世界》，《秧歌》，冷戰，文化外交，

**A Diasporic Writer in the Cold War Era:
The Representations of Eileen Chang
in the *World Today Journal***

Shan, Te-hsing³

Abstract: Eileen Chang (1920-1995) stayed in Hong Kong three times. Of these, the second visit (from July 1952 to May 1955) was most special. As the self-proclaimed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the USA made every effort to contain the expansion of Communism supported by the USSR. In addition to confrontations in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cultural diplomacy stressing soft power was also an important strategy.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the USIS) in Hong Kong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in two main ways. On the one hand, the World Today Press published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hundreds of representative American texts in an attempt to showcase the freedom, democracy, and openness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the *World Today Journal* tried its best to reach out to as many readers as possible and beca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Chinese magazines spanning over different continents. The World Today Press published Chang's translations of American novels, poetry, essays,

³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Taiwan, ROC

and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mphasized her role as a translator. In contrast, the *World Today Journal* serialized her anti-Communist novel *The Rice-Sprout Song*, published reviews of her novel and translations, and reported on her being a writer-in-residence in an American university, emphasizing her role as a writer. Different from the majority of research on Chang, based on her published books, the current study focuses on the *World Today Journal* and connects her to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Hong Kong during the Cold War era,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the USIS. It is hoped that by highlighting the representations of Chang in this leading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a special historical juncture, we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on Eileen Chang Studies, which are in full swing with 2020 marking the on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her birth.

Keywords: Eileen Chang, *World Today Journal*, *The Rice-Sprout Song*, the Cold War, Cultural Diplomacy

一、三訪因緣：張愛玲的香港時期

張愛玲（1920-1995）與香港有著特殊的因緣，先後待過三次：第一次為 1939 年 8 月至 1942 年 5 月，第二次為 1952 年 7 月至 1955 年 5 月，第三次為 1961 年 10 月至 1962 年 3 月。⁴ 三次的身分不同，結果迥異。前兩次的身分分別為大學生以及譯者／作家，對她的個人生涯與文學創作具有重大影響。第三次係應好友宋淇（林以亮）代表電懋電影公司之邀前往編劇，停留時間較短，而且過程並不順利。⁵

張愛玲首次前往香港，在校期間努力學習，並歷經英、日不同政權統治，這些求學與生活經驗提供了許多生命養分與創作素材，足以讓她返回上海後再三反芻與發揮，並在報章雜誌發表中英文作品，逐漸嶄露頭角。1944 年，張愛玲於上海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傳奇》，樹立自己的文壇地位，其中的〈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傾城之戀〉便是以香港為背景，尤以後者為代表作，曾改編成舞臺劇與電影。王德威曾如此形容上海時期的張愛玲：「淪陷時期最走紅的女作家、『最後的貴族』、胡蘭成的秘密妻子、著名電影編劇……」⁶

4 參閱張惠苑編：《張愛玲年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年），頁 31-37，78-87，119-129。

5 詳見她寫給夫婿賴雅（Ferdinand Reyher）的家書，英文原文與中譯參閱高全之：〈倦鳥思還：張愛玲寫給賴雅的六封信〉，《張愛玲學》（臺北：麥田，2011 年），頁 383-403；也可參閱周芬伶著、謝毓祥譯：〈張愛玲夢魘——她的六封家書〉，《印刻》，第 11 期（2004 年 7 月），頁 59-68。

6 王德威：〈重讀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麥田，1998 年），頁 75-76。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張愛玲留在上海，1950 年 7 月下旬出席首屆上海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並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前往蘇北農村參加土改兩個月。⁷張愛玲停留上海期間曾發表《十八春》與〈小艾〉，然而不僅自己不滿意，也難符合官方「歌頌土改」的要求。⁸有感於創作空間愈趨狹隘，張愛玲遂以繼續先前未竟的學業為由，於 1952 年 7 月第二度前往香港，卻終其一生未再踏上中國大陸故土一步。

再度赴港的張愛玲已非昔日吳下阿蒙，卻又不免帶著幾多滄桑。在上海文壇打下一片天地的她，頂著作家的光環重返學生時代的舊地，熟悉中又有一些陌生。另一方面，身為選擇離開赤色中國的文人，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那片大陸已然回不去了，即便重訪香港，也舉目無親，孤身女子如何在亂世中求生，實為最卑微且現實的需求，而繼續追逐文學之夢更成了既華麗又蒼涼的願景。

時值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陣營對峙，美方自詡為自由世界領袖，全力圍堵國際共產主義擴張，除了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抗衡，呈現軟實力的文化外交也是重要策略，各地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簡稱 USIS，下文簡稱「美新處」）為

⁷ 參閱張惠苑編：《張愛玲年譜》，頁 75-76；陳子善：〈張愛玲與上海第一屆文代會〉，《張愛玲叢考》（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 年）。

⁸ 參閱陳子善：〈張愛玲創作中篇小說《小艾》的背景〉，《張愛玲叢考》（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 年）；高全之：〈《小艾》的無產階級文學實驗〉（臺北：麥田，2011 年）；余斌：《張愛玲傳》（臺北：晨星，1997 年），頁 287-288，293-298。劉再復認為張愛玲這兩部作品「明顯地迎合時勢。因為並不違背生活的真相，因此很難說這種迎合有違作家的良心，但是，作為一個宣稱遠離革命的才女，却暴露出她的困境」，參閱劉再復：〈張愛玲的小說與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再讀張愛玲》（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41。

主要執行機構，其中香港領事館不僅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美新處之一，更在華文世界扮演關鍵角色，多方聯繫港、臺作家，並以優厚酬勞邀請。而漂泊離散到香港的張愛玲，此時的困境正如高全之指出：「當時張愛玲剛剛經過新中國的革命洗禮，在香港驚魂甫定，立即面臨自立謀生的問題」。⁹然而天無絕人之路，張愛玲的求生之路與文學之夢竟因為翻譯而出現轉機，而且此事與香港美新處密切相關。

1951年宋淇獲「特殊禮聘」進入美新處譯書部，「和文化部主任 Richard M. McCarthy（麥卡錫）合作整頓了無生氣的譯書部」，¹⁰具體措施包括「大事提高稿費五六倍」，遂能請動港、臺好手加入翻譯行列。當時美國新聞總署「取得海明威《老人與海》中文版權」，為求慎重「遂登報公開徵求翻譯人選，應徵的人不計其數」。¹¹中英文俱佳的張愛玲便循此管道前來應徵。宋淇夫婦在上海時即為「她的忠實讀者」，並且「迷上」她的作品。¹²其好友、翻譯家傅雷曾以迅雨為筆名，於1944年5月《萬象》月刊發表〈論張愛玲

⁹ 高全之：〈盡在不言中：《秧歌》的神格與生機〉，《張愛玲學》，頁156。

¹⁰ 當時通行譯法為「麥加錫」，唯宋以朗與高全之均譯為「麥卡錫」，本文暫從眾。

¹¹ 宋以朗：《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202-203。海明威的中篇小說《老人與海》（Ernest Hemingway, *The Old Man and the Sea*）1952年9月1日於美國《生活》雜誌（*Life magazine*）一次刊完，風靡一時，作者次年獲得普立茲獎，195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有關宋淇與香港美新處的淵源，參閱宋以朗：《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頁202-203。

¹² 宋淇：〈私語張愛玲〉，收入蔡鳳儀編：《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紀念文集》（臺北：皇冠，1996年），頁105。

的小說），為張愛玲評論傳承（critical heritage）的奠基之作。宋淇等人約她面談時，「印象深刻，英文有英國腔，說得很慢，很得體，遂決定交由她翻譯」，¹³ 開始了與香港美新處的合作關係，進而與宋淇、鄭文美結為至交，赴美後數十年一直保持密切聯繫，甚至託付身後之事。

因此，張愛玲的第二香港時期以美新處翻譯為重要收入來源。儘管應邀翻譯的是美國經典文學或現當代傑出作家，但她「對翻譯的興趣不大」，其態度於底下的說法表露無遺：「我逼著自己譯愛默森，實在是沒辦法，即使是關於牙醫的書，我也照樣會硬著頭皮去做的」；也曾如此「訴苦」：「譯華盛頓·歐文的小說，好像同自己不喜歡的人說話，無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¹⁴ 然而美新處的優渥稿酬不但提供了她在香港的生計所需，也由此衍生出她追逐文學夢的機緣。綜觀她這段時期的文字產出，以翻譯最多，均由香港美新處贊助的幾家出版社出版，發行於冷戰時期的華文世界，其中以今日世界出版社發行的譯作最具代表性，成就了「譯者張愛玲」

¹³ 宋以朗：《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頁 203。張譯於 1952 年初版時使用筆名「范思平」，直到海明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張譯三版問世，才改用本名，並撰寫兩頁的〈序〉。

¹⁴ 宋淇在〈私語張愛玲〉中引用張愛玲的說法，請參閱宋淇：〈私語張愛玲〉，收入蔡鳳儀編：《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紀念文集》，頁 109-110。宋以朗編輯的《張愛玲私語錄》以語錄體呈現，文字有異：「當時我逼自己譯愛默森，即使是關於牙醫的書，我也照樣會做的」；「譯 Washington Irving——好像同你不喜歡的人說話，無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可參考張愛玲、宋淇、宋鄭文美著，宋以朗編：《張愛玲私語錄》（臺北：皇冠，2010 年），頁 47-48。箇中原因或許值得版本學者探討，然均可看出張愛玲當年從事翻譯時的無奈。

的角色。¹⁵

今日世界出版社與今日世界社同屬香港美新處旗下的組織，成立目的在於執行美國冷戰時期圍堵戰略下的文化外交政策。今日世界出版社的業務集中於翻譯、出版與美國相關的書籍，以間接迂迴的方式呈現美國的軟實力，以示其典章、制度、思想足為自由世界的表率，其中又以美國文學譯叢的數量最多、最有系統、影響深遠而受人矚目。今日世界社的主要目標在於時事與文化宣傳，出版雜誌、期刊、書報等，以《今日世界》雜誌的讀者群最廣，為該社的代表性刊物。¹⁶

¹⁵ 這些出版社包括中一出版社、天風出版社、今日世界社。有關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美國文學翻譯及「今日世界譯叢：文學類」書目，參閱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翻譯與脈絡》修訂版（臺北：書林，2009年），頁117-157；有關張愛玲的美國文學中譯，其譯作的演化、翻譯策略與得失，以及張愛玲中譯、英譯與自譯一覽表，參閱單德興：〈含英吐華：譯者張愛玲——析論張愛玲的美國文學中譯〉，《翻譯與脈絡》修訂版，頁159-204。此外，張愛玲此時也受美新處之託，英譯陳紀滢的反共小說《荻村傳》（*Fool in the Reeds*），1959年由香港的虹霓出版社（Rainbow Press）出版。參閱陳紀滢：〈《荻村傳》的翻譯始末——兼記張愛玲〉，《聯合文學》，第29期（1987年3月），頁92-94。

¹⁶ 曾在此二單位任職的李如桐與張同在2004年接受筆者電話訪談時，強調今日世界社與今日世界出版社各有職掌，前者的業務為新聞與宣傳，以出版雜誌為主，對象為一般讀者，後者的業務為翻譯與出版叢書，對象主要為教育界與文化界。然而查閱出版的譯作發現，早年都以今日世界社之名，後來才改為今日世界出版社，有時同一本書竟然同時出現兩個單位的名稱。因此，此處引用他們的說法以示區分，文中則以各書的版權頁為準。王梅香於2020年8月27日致筆者的臉書訊息表示，在美方的譯書計畫檔案中，一般書籍出版業務置於Information Center Service，雜誌、期刊、書報等業務則置於Press and Publication

《今日世界》為典型的冷戰時期產物。該刊原名《今日美國》，1949年10月由香港美新處出版，1952年3月改名，第一期於3月15日出版，為雙週刊，每期36頁。自第507期（1973年5月）改為月刊，篇幅加倍。後來因為美蘇對峙形勢緩和，此刊完成階段性任務，便於1980年12月停刊，共出版598期。¹⁷根據該社統計，《今日世界》鼎盛時期的銷量高達十七萬五千份。張愛玲的《秧歌》於1954年1月第44期開始連載，該期社評透露其讀者有二十餘萬之多。¹⁸儘管兩者之間的數字有落差，但該刊為當時華文世界流通最廣的雜誌則為不爭的事實。由於兩社都在美新處旗下，負責執行美國文化外交政策，相互支援，分進合擊，也就理所當然。

這種情形也出現在張愛玲身上。質言之，出版社負責張愛玲譯作的出版與發行，強調的是「譯者張愛玲」；《今日世界》雜誌則連載張愛玲的小說創作《秧歌》，刊載張愛玲的譯作與小說的相關書評與活動報導，偏向於「作家張愛玲」。二者相輔相成，對張愛玲與美新處雙方都發揮了互惠的作用：一方面，如此作為可強化張愛玲身為文字工作者的身分與特色，以增加收入、提升地位與影響力；¹⁹另一方面，美新處旗下的作家和譯者得到如此重視，有利於

Service，然而「基於宣傳與商業利益，兩者可以互相轉換。」王梅香：致作者臉書電郵，2020年8月27日。

¹⁷ 參閱單德興：〈美國即世界？——《今日世界》的緣起緣滅〉，《攝影之聲》，第20期（2017年），頁18-25。

¹⁸ 1980年11月號，亦即停刊前一期，〈本刊啟事〉指出其「銷量一九六五年達到了頂峰，曾有過一期銷數達十七萬五千份的紀錄」。12月號的〈寫在最後一期「今日世界」〉則提到該刊於二十八年間「總共印行了七千八百八十五萬一千五百零一本」。由於銷量與總印行量的數據相當明確，應比大略估算的讀者數二十餘萬準確。

¹⁹ 此情形正如雷飛維（André Lefevere）有關文學系統中「贊助者」（patron）

出版社與雜誌社的形象，以及文化外交任務的執行。

就美新處而言，張愛玲與旗下大多數譯者最大不同在於，她二度赴港之前已在上海的報章雜誌發表中、英文文章，出版文學作品，參與編劇，在中文世界享有文名，並有在中共體制下生活的第一手經驗。因此，除了善用其雙語能力，邀約她翻譯美國文學作品之外，美新處也有意充分運用她的寫作才華、既有名氣與親身體驗，透過文學創作，以靈活多元的運作模式吸引更多中文世界的讀者，潛移默化，將效應極大化，迂迴達到官方設定的反共目標，間接遂行冷戰時期圍堵國際共產的使命。有別於當時壁壘分明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統治下的兩岸，香港雖在英國殖民治理下，卻允許不同陣營的作品流通，彼此爭鳴，競逐言論場域，成為中文世界裡文化與思想最開放的地區。時任美新處處長的麥卡錫為美國在華文世界文化外交政策的主要執行者，出身愛荷華大學，主修美國文學，曾懷抱作家夢，後來投身外交界。²⁰ 他衷心欣賞張愛玲的才華，兩人於公是翻譯與寫作計畫的合作夥伴，於私則為朋友關係，終生不輟。

張愛玲接下美新處的翻譯工作，固然為稻粱謀，勉力從事一般人心目中缺乏創意、為人作嫁、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然而在生計無虞之後，她的文學夢復甦，繼續從事創作，並主動向美新處提議此事。其實她第一次自香港返回上海後，英文作品曾多次刊登於 *The*

的說法，涉及主題的意識形態、經濟資助與名聲地位，屬於三者合一、「沒有區別的」（“undifferentiated”，17）贊助，參閱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16。

²⁰ 參閱高全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訪問麥卡錫先生〉，《張愛玲學》，頁 251。

XXth Century (《二十世紀》)，²¹ 對自己的英文寫作有相當程度的信心與期許，曾表示林語堂「英文用字時常不恰當」。²² 除了翻譯與中文創作之外，若能藉由美新處的資源與協助，實現進軍英文世界的願望，如同林語堂、韓素音般以英文著作名聞國際，也會是一樁美事。

換言之，香港對於張愛玲的寫作與未來走向發揮了關鍵性的影響。蘇偉貞便提到這段「『香港時期』的關鍵位置及微妙性」，²³ 以及香港「在地理上成為她與中國／美國間的跳板」（《孤島》，頁 65）。她引用王德威「張愛玲必須回到上海才能書寫香港」之說，²⁴ 並做如下引申：「張愛玲必須回到香港才能書寫上海」（《孤島》，頁 8-9）。她更引用張愛玲的〈浮花浪蕊〉，指出再臨香港有如「『走陰的回到陽間，有一種使命感』」（《孤島》，頁 65），²⁵ 並認為這「可與張愛玲一九五二年後私人經驗印證」（《孤島》，頁 66）。²⁶ 因此，分別以上海附近與北方農村為背景所寫的

21 相關書目與討論可分別參閱單德興：〈含英吐華：譯者張愛玲——析論張愛玲的美國文學中譯〉，《翻譯與脈絡》修訂版，頁 190-93 與鄭樹森：〈張愛玲與《二十世紀》〉，鄭樹森編選：《張愛玲的世界》（臺北：允晨，2004 年）。

22 宋以朗編，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著：《張愛玲私語錄》，頁 65。

23 蘇偉貞：《孤島張愛玲——追蹤張愛玲香港時期（1952～1955）小說》（臺北：三民，2002 年），頁 10。為行文簡潔之便，有關此文後續引文將以（《孤島》，頁碼）之形式直接註明。

24 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麥田，1998），頁 284。

25 原文參閱張愛玲：〈浮花浪蕊〉，《惘然記》（臺北：皇冠，1983 年），頁 64。

26 王德威也根據這段文字，指出張愛玲「重臨香港……竟有『從陰間回到陽

《秧歌》與《赤地之戀》，可視為這種歷劫歸來、警示世人的感受下的產物。

香港作家與評論家梁秉鈞針對「張愛玲與香港的關係」，指出在 1930、1940 年代，「香港的地理空間和人事為張愛玲擴闊了寫作題材」，而在 1950、1960 年代，「香港的文化空間為張愛玲的現代中文寫作提供了新的可能與限制」。²⁷ 他表示即便在美元文化的脈絡下創作，《秧歌》與《赤地之戀》證明了「張愛玲更早地觸及禁區，正由於她當時置身於鄰近的邊緣地帶香港。她的政治作品與時人視野並不相同。《赤地之戀》甚至未能在臺灣刊行，可見香港當時確是提供了不同於中國大陸及臺灣而讓不同意見共存的空間」。²⁸ 筆者則認為根據當時的地緣政治，香港即使處於兩大敵對陣營的邊緣，但就思想空間與文化生產而言，此地是既交集（華人與華文）也聯集（反共與共產）之處，為最開放多元的所在，也是各方政治勢力交鋒的前哨站，以及文化勢力激盪競逐的場域。²⁹ 美

間之感」，而斯人已微近中年」，參閱王德威：〈重讀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麥田，1998 年），頁 337。

²⁷ 梁秉鈞：〈張愛玲與香港〉，收入劉紹銘、梁秉鈞、許子東編：《再讀張愛玲》（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頁 199。

²⁸ 梁秉鈞：〈張愛玲與香港〉，收入劉紹銘、梁秉鈞、許子東編：《再讀張愛玲》，頁 200。

²⁹ 參閱 William Tay（鄭樹森），“Colonialism, the Cold War Era, and Marginal Space: The Existential Condition of Five Decades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in Pang-yuan Chi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a Modern Century: A Critical Survey*, Michelle Yeh tran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 Pr., 2000)；也可參閱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翻譯與脈絡》

新處就善加運用香港這種獨特的利基與發言位置，來進行其文化外交任務。

因此，張愛玲除了原本的美國文學中譯之外，藉由美新處的資源，進行自己的中文與英文創作，也就不足為奇了。有人認為張愛玲這段期間創作的反共小說為美新處授權或委託之作，進而得到其為政治文學、藝術成就必然低落的結論。然而這種推論未免失之簡化。張愛玲身為作家自有其文學標準與藝術考量，何況當時她有意以英文進軍國際文壇，當不致畫地自限，僅僅以符合美新處的政治訴求為滿足。此外，張愛玲對自己的文學創作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堅持與主動，而且作品也確實令人驚艷。麥卡錫在接受高全之的訪談時就指出，「我們請愛玲翻譯美國文學，她自己提議寫小說。」他也提到，「初讀《秧歌》頭兩章，我大為驚異佩服。我自己寫不出那麼好的英文。我既羨慕也忌妒她的文采」。³⁰ 該訪談提及當時訪問香港的美國普立茲小說獎得主馬寬德（John P. Marquand）肯定「這是一流作品」，並帶了前兩章返回美國「幫助推介，使《秧歌》在美國出版」。³¹ 麥卡錫特別強調，「我們絕對沒有嘗試藉討論來操縱或『幫助』《秧歌》的寫作。……我們無法使《秧歌》更好」。³²

再就當時的情況而言，許多與美新處合作的港臺作者和學者，本身便抱持堅定的反共立場（夏濟安、夏志清兄弟便是明顯的例

修訂版，頁 121-122。

³⁰ 高全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訪問麥卡錫先生〉，《張愛玲學》，頁 253。

³¹ 高全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訪問麥卡錫先生〉，《張愛玲學》，頁 253-254。

³² 高全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訪問麥卡錫先生〉，《張愛玲學》，頁 254。

子），在一方有學識、才華，另一方有資源、管道的情形下，受委託的文人因勢利導，借力使力，藉由贊助者的支援，發揮自己的能力，實現個人的文學目標，當不致因為共同的政治理念，而執著於僵化的意識形態，犧牲作家風格、學者風範、藝術標準或學術要求。³³總之，張愛玲第二段香港時期的翻譯和創作與美新處關係密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其性質為雙方的合作，而非單方的操控。相關研究若能深入當時的歷史情境、文化脈絡與具體文本，將有助於兼容並蓄、勾陳出新的探討。

大多數人在研究張愛玲此期的文字成果時，多集中於文學創作，往往忽略她當時為數更多的譯作。此外，當時張愛玲雖主要以翻譯謀生，依然堅持以中、英文從事文學創作，那段期間正式發表的中文創作只有《秧歌》，並先於《今日世界》連載，連載結束當月出版單行本。若是忽略此連載版，可能導致相關研究的若干缺憾。³⁴再者，目前的定論是出入於中英文之間的張愛玲，在香港先

³³ 如夏志清就提到，「故友宋淇、先兄濟安都曾為美國新聞處編譯了不少書，但他們覺得揭露共產國家的暴政，譯介美國文學之精品，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從不因為擔任此項工作而有愧於心」，參閱夏志清編註：《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臺北：聯合文學，2013），頁 77-78。

³⁴ 《秧歌》連載版的重要意義之一就是將此作品置於其最初的出版史與接受史中，以免發生訛誤。《秧歌》先有英文稿，再有中文稿已成定論，見高全之：〈盡在不言中：《秧歌》的神格與生機〉，《張愛玲學》，頁 156。然而張愛玲的英文版兩頁〈序〉（“Preface”）結尾署名「香港／一九五五年一月」（“Hong Kong / January 1955”），比連載版整整晚了一年，請見 Chang, Eileen. *The Rice-Sprout Song*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5), vi。宋以朗也提到英文版因在國外出版耗時，而比中文版晚出。羅秀美在歷數該書「中英文版的出版情形」時說，「1955年由美國 Charles Scribner's Sons 出版了英文版 *The Rice-Sprout Song*（秧歌）；1963年6月，

以英文創作《秧歌》，再自己譯寫為中文，³⁵ 但論者卻很少檢視最早連載此作品的《今日世界》，連載版與單行本之間有何差異？這些差異可能具有的意義？以及該雜誌社如何與同一旗下的出版社配合，介紹自家的譯者與譯作，尤其是較易普及的美國文學？³⁶

因此，本文旨在另闢蹊徑，將張愛玲第二個香港時期連結到冷戰時期香港的歷史與文化脈絡，尤其是美新處的文化生產機制，並聚焦於《今日世界》所呈現的張愛玲，包括她在這段期間最具代表性的文學創作《秧歌》，對她的譯作與《赤地之戀》的評論，以及有關她的報導。這種歷史化與脈絡化的處理方式，縱然不免有如「古物出土」，³⁷ 但有助於了解在冷戰時期風行海內外的這本中文雜誌所呈現的張愛玲形象，為目前蔚為顯學的張愛玲研究提供另類視角下的一塊拼圖。

香港 Dragonfly Books 重印英文版，1966 年 10 月二版。中文版則遲至 1968 年，由臺灣的皇冠出版社出版……」，遺漏了在英文版問世前一年即出版的連載版與今日世界版，參閱羅秀美：〈張愛玲的「翻譯」文學：試論她如何以「翻譯」傳播並接受他者／自我的華文小說〉，收入林幸謙編：《張愛玲：傳奇·性別·系譜》（臺北：聯經，2012 年），頁 437。陳建忠則關照到最早於香港出版的連載版與單行本，並提到《今日世界》連載的起迄年月、期數並附有插圖，惟插圖者「應如係」應為「應如系」，而且並非每期都署名，詳下文。

³⁵ 參閱高全之：〈盡在不言中——《秧歌》的神格與生機〉，《張愛玲學》，頁 156、180。

³⁶ 參閱單德興：〈冷戰·文學·傳播——《今日世界》與美國文學在華文世界的傳播〉，收入王安琪、張上冠編：《文化傳承：文學與語言——袁鶴翔講座教授八秩晉五榮退紀念文集》（臺北：書林，2019 年），頁 47-90。

³⁷ 宋淇：〈私語張愛玲〉，收入蔡鳳儀編：《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紀念文集》，頁 123。此處為張愛玲對自己舊作被人發掘的形容。

二、《今日世界》中的小說家張愛玲及《秧歌》

（一）《秧歌》出版史以及背後的故事

《今日世界》中有關張愛玲的呈現，都出現於 1973 年 5 月改版之前的半月刊，其中最為人知的就是在每期有限篇幅（三十六頁）中連載的《秧歌》。王梅香根據美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簡稱 NARA）的資料指出，香港時期的「小說家張愛玲」最為人矚目的《秧歌》與《赤地之戀》都是在香港美新處的譯書計畫中，「既是『委託之作』，也是『授權之作』，更是美援文藝體制『反共文宣』的具體成果」。³⁸ 然而兩書的生產過程與屬性有異，《秧歌》原為張愛玲的「自主寫作」，但因緣際會，在「寫作過程中被納入美新處譯書計畫」；《赤地之戀》則一開始便「屬於美新處與作家『共同合作』的作品」，根據「寫作大綱接續書寫」（〈不為人知〉，頁 73）。³⁹ 因此，《秧歌》為張愛玲主動之作，先寫出英文版，再譯寫為中文，《赤地之戀》

³⁸ 王梅香：〈不為人知的張愛玲：美國新聞處譯書計畫下的《秧歌》與《赤地之戀》〉，《歐美研究》，第 45 卷第 1 期（2015 年 3 月），頁 73。為行文簡潔之便，有關此文後續引文將以（〈不為人知〉，頁碼）之形式直接註明。

³⁹ 另可參閱宋以朗：〈關於《秧歌》與《赤地之戀》的評價〉，《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頁 208-228，其中也提到「張同（阿五）一直是〔《今日世界》〕的編輯。今日世界出版社前前後後的編輯則有董橋、林以亮、李如桐、韓廸厚、余也魯、胡菊人、戴天、岑逸飛等人」，見宋以朗：〈關於《秧歌》與《赤地之戀》的評價〉，《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頁 216。

則先有中文版，再譯寫為英文。

王梅香進一步提供了《秧歌》的申請單（〈不為人知〉，頁 100），⁴⁰ 指出其中「美新處建議給予出版商的協助」項下明確寫道：「美新處以 400 美元向作者購買手稿，部分故事將在美新處雜誌《今日世界》連載，該書合訂本由美新處今日世界社出版。印刷數量將由其他美新處的訂單所決定，預計以 450 美元印 5,000 本。全部費用 850 美元」（〈不為人知〉，頁 100）。申請單的日期為 1953 年 11 月 30 日，只比《秧歌》在雜誌連載早一個月，而且全書預估約一百六十頁，預計零售價格為港幣 1.80 元（折合 0.30 美元）（〈不為人知〉，頁 100）。由此可見當時不僅書稿已經就緒，甚至連問世的方式（先連載，再出書），頁數、定價、印量、總費用等都已相當明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該申請單上有關作者的描述、內容簡介以及預計達成的目標，由於是內部資料，更代表了香港美新處的看法，尤其是對張愛玲及《秧歌》的定位：

張愛玲是上海有名的羅曼史小說家（1942-1949），也寫過幾部劇本。去年來到香港，《秧歌》是她「第一次」從事政治的書寫；

小說的場景設定是共產統治下的中國農村；

沒有謾罵，該部小說呈現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農村。相較於那些缺乏文學技巧和想像力的小說，該書大大地超過這種類

⁴⁰ 其中註明該表格取自 Authorization Form, USIS Hong Kong to USIA, “Book Translation Program,” November 30, 1953, Hong Kong; U.S. Consulate, Hong Kong Classified General Records of the USIS, 1951-1955, Entry 2689, RG 84 (NARA, n.d.)。

型的小說，而且具有說服力。（〈不為人知〉，頁 100）

這些描述中至少有三點值得注意：首先就是將《秧歌》定位為「政治的書寫」，這可能係因官方內部作業，以說服上級，增加出版此小說的正當性。其實相較於其他作家，這位 1940 年代上海出名的羅曼史小說家兼劇作家，運用平實的手法，在文學技巧上明顯超越其他明目張膽、甚至「謾罵」的政治小說，對一般讀者會更有吸引力與說服力。其次，「第一次」撰寫此類作品之說是為了強調作家的轉型，以示難能可貴，然而證諸她在中共統治下曾撰寫的《十八春》與〈小艾〉，此說恐有商榷之處。再者，雖然此處未強調張愛玲在中共佔領的大陸有親身的觀察與體驗，但「去年來到香港」之說便暗示她曾在那裡待過三年，而且這三年的身分不再是浪漫史小說家。

由於雜誌具時效性，而且鮮少人收藏，因此一般人知道的《秧歌》為單行本。此書最初的單行本於 1954 年 7 月《今日世界》連載結束，當月即由今日世界社印行（中華民國四十三年與公曆年份並列），爾後以臺灣的皇冠版最廣為流傳。追本溯源，《秧歌》最早版本係於《今日世界》連載，始於 1954 年 1 月 1 日（第 44 期），終於 7 月 1 日（第 56 期），前後十三期。⁴¹ 若要進一步感受讀者閱讀此小說的初體驗，就必須置於當時雜誌的文本脈絡以及相關的文化（與）政治脈絡。

《秧歌》連載的前三期都出現於該刊封面標題，並與另一則新

⁴¹ 王梅香在致筆者的臉書訊息表示，《今日世界》於 1954 至 1955 年時有缺稿現象，會刊登小說連載或翻譯作品，甚至找中國國民黨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提供稿件。王梅香：致作者臉書電郵，2020 年 8 月 27 日。由此可見香港美新處與其反共盟友中華民國政府、甚至中國國民黨的關係密切。

聞出現於同一行：「蔣經國訪美・秧歌 張愛玲」、「林黛與『春天不是讀書天』・秧歌（二）（張愛玲）」、「吳陳合演真相・秧歌（張愛玲）」。在此三期封面搭配的新聞中，第一期〈蔣經國訪美觀感——本刊通訊〉涉及嚴肅的中美關係，為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長子、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應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之邀，前往考察五星期，返臺後接受美國之音駐臺記者的錄音訪問。⁴² 第二期搭配的〈林黛與「春天不是讀書天」〉，報導的是香港女星林黛即將上映的新片《春天不是讀書天》，裡面的演員中赫然發現後來的名導演胡金銓和李翰祥。⁴³ 該期封面是林黛生動的舞蹈照片。第三期圖文並茂的〈吳陳武術合演真相〉，是有關太極拳師吳公儀與白鶴派拳師陳克夫於澳門的武術合演，配合李景開拍攝兩人對打的七張照片。⁴⁴ 該期封面在《秧歌》之上的標題是〈李麗華女士自傳〉，最醒目的就是明星李麗華的古裝照片。連載結束當期的雜誌封底出現「秧歌 張愛玲著（今日世界叢書之九）」，作為此書廣告，配合上插圖、文字與亞洲十七家和非洲一家銷售處，並註明由「友聯書報發行公司總經售」。

⁴² 今日世界：〈蔣經國訪美觀感〉，《今日世界》，第 44 期（1954 年 1 月 1 日），頁 27。

⁴³ 鄺馨：〈林黛與「春天不是讀書天」〉，《今日世界》，第 45 期（1954 年 1 月 15 日），頁 10。「鄺馨」疑為鄺文美（筆名方馨），因宋淇夫婦熟識香港影業界。

⁴⁴ 李景開攝：〈吳陳拳術合演真相〉，《今日世界》第 46 期（1954 年 2 月 15 日），頁 5。



圖一、第 44 至 46 期《秧歌》連載前三期封面；第 56 期封底

《秧歌》連載時並無作者簡介或編者前言。然而刊前的社評卻具現了時代環境以及旗幟鮮明的反共立場。以前三期的社評為例，初次連載的第 44 期社評〈向親愛的讀者致敬〉明言，「我們的社評，一向都是用來檢討自由世界的局勢，並揭露共黨的曲解與虛偽宣傳。」⁴⁵文中提到該刊讀者「估計約有二十餘萬人」，至於「我們的發行網，雖然祇限於自由中國及東南亞各地，但是在我們每天收到的數百封讀者來信中，卻發現有居於歐洲，美洲，澳洲和太平洋小島嶼的忠誠讀者」，這些讀者表示「本刊是他們所能看到的唯一中文刊物，也是關於遠東方面的消息的唯一來源」，而應讀者建議而開闢的服務欄，「每一期所收到的來信，總在五百封以上。」⁴⁶由於這些都是該刊自己的說法，相關數字，尤其每日來信數字，外人難以核實（美新處資源豐厚，其中可能不少是公關或贈閱之用），但至少可看出《今日世界》有意塑造的（自我）形象是讀者眾多，分布廣闊，反應熱烈，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區具有獨特性與壟斷性。

社評中較能讓人聯想到《秧歌》作者張愛玲的，在於對讀者的

⁴⁵ 今日世界：〈向親愛的讀者致敬〉，《今日世界》，第 44 期，頁 1。

⁴⁶ 今日世界：〈向親愛的讀者致敬〉，《今日世界》，第 44 期，頁 1。

描述：「讀者們許多都是從鐵幕後逃出來的，他們為了反侵略，反奴役，反極權與求和平自由而遠奔異鄉，過著非常艱苦的生活；他們那種百折不回的精神，值得欽佩，值得我們致以最崇高的敬禮。」類似描述持續出現於下一期社評〈偉大的同情與友愛〉。此篇由香港最近一場大火談起：深水埗白田村木屋區數千屋宇燒燬，六萬人無家可歸。社評指出，「這次被災的居民，大部份是從鐵幕中逃出來的。他們原有溫暖的家和美麗的田園；但是為了反侵略，反奴役，反極權和爭取自由而遠奔異鄉，過著非常艱苦的生活。」相較於前一篇社評，此篇進一步聯想到「中國大陸千千萬萬在水深火熱中的人們」：

他們在共黨血腥統治下，遭遇到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最大災難——水災，旱災以及一切人為的災難。他們不但被剝奪了最珍貴的自由，而且在中共恐怖與一面倒政策下過著最非人的生活，家破人亡，流連顛沛，他們所蒙到的痛苦，百倍於深水埗的火災災民。他們所遭受的，正是中國五千年來最悲慘和最苦難的命運。⁴⁷

如果說這兩篇社評中有關難民之說相當程度符合了當時張愛玲的處境，那麼此處所指的天災與人禍則暗合《秧歌》處理的主題。再下一篇社評〈從一天看兩個世界〉，則藉由農民節對比自由中國臺灣與共產中國大陸。文中先指出臺灣實行三七五減租之後糧食增產，農民豐衣足食，接著筆鋒一轉：

反觀大陸的共產黨，正奴役著億萬人民，共產黨對付農村，標分的「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都可以由共產黨幹部任意指定，清算鬥爭，先是殘殺地主，然後再

⁴⁷ 今日世界：〈偉大的同情與友愛〉，《今日世界》，第 45 期，頁 1。

把小康之家的「富農」，充做清算鬥爭的目標，層層清算，個個鬥爭。共產黨又模仿蘇俄的集體農場，歸併土地，集體耕作，把農作物視同工廠的產品，全部由共黨統制，同時更剝奪農民的一切自由，劫奪農民的財產，轉而獻給蘇聯老大哥。共產黨職業謊言專家儘管大吹大擂，什麼農產激增，農民豐衣足食，但却無法一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饑民的呻吟，衝破了鐵幕，四川，西康，桂州及雲南各省，哀鴻遍野，餓殍載道，却是鐵一般的事實。⁴⁸

此篇除了批評共產黨模仿與奉獻蘇聯老大哥之外，並推而廣之，指出蘇聯在東歐的附庸，如捷克、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等國，都公開承認「混亂而嚴重的糧食情形」。社評最後一段強化自由世界與鐵幕世界的對比：「值茲農民節，放眼看自由世界的農民，他們正在過著自由而愉快的生活。在另一方面，鐵幕後的農民在恐怖的陰影下呻吟，飢餓，走到了死亡的邊緣〔緣〕。」⁴⁹

以上三篇社評剛好出現於《秧歌》連載的頭三期，明確標舉反共立場，並嚴詞抨擊共產黨，指出共產國家在蘇聯老大哥率領下，人民普遍蒙受的苦難，特別集中於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並對比追隨美國民主自由路線的臺灣。⁵⁰ 循序漸進的鋪陳，以及有關逃港難民與中國農民的說法，難免讓人聯想到張愛玲與正在連載的《秧

⁴⁸ 今日世界：〈從一天看兩個世界〉，《今日世界》，第46期，頁1。

⁴⁹ 今日世界：〈從一天看兩個世界〉，《今日世界》，第46期，頁1。

⁵⁰ 接下來在《秧歌》連載期間的社評，主要內容為日內瓦會議、越戰與韓戰，如第49期的〈日內瓦會議前瞻〉、第50期的〈日內瓦會議並非「五強會議」〉、第52期的〈越南戰爭的重要性〉、第53期的〈韓國的復興〉、第55期的〈民主制度的實踐〉（自韓戰爆發以來的大韓民國議會首次選舉），提供了美國視角的亞洲局勢以及國際間的折衝。

歌》。第 46 期也刊出張愛玲在上海就知道、在香港見面的名影星李麗華之文〈李麗華自傳〉，⁵¹ 自述如何幡然悔悟，棄暗投明，與張愛玲的遭遇也有相近之處。在期刊中同時出現的這些文本，更容易讓人從政治與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待張愛玲的寫作背景與創作動機。

儘管當時流風所及，反共文學蔚然成風，在臺灣更成為「政治正確」的主流文化與文藝思潮，然而《秧歌》能夠流傳至今並非只靠張愛玲的光環，更非因為當初美新處的贊助或身為反共作品，而是小說本身超脫一時一地的政治框架與意識形態，展現了獨特的藝術價值與深刻人性，一如良好的文學能穿越時空，感動不同世代與地方的人。換言之，將《秧歌》置於原初連載的脈絡中，益發凸顯張愛玲寫作時二元對立的國際政治局勢，以及她如何在此局勢中，既能把握當時流通最廣的中文平臺，發表自己的文學創作，又不致為反共的口號與宣傳所挾持，淪為政治信念與意識形態的工具。

《秧歌》全書十七章，於《今日世界》分十三期連載，每期三至四頁，插圖為簡單的素描，少則一張，多則四張，較常出現的是兩、三張，配合內文，以人物為主，開始時刊頭並未署名，後來署名「應如系」，但最後幾期又未署名，儘管不確定十三期的插畫者是否為同一人，但畫風大同小異。⁵² 《秧歌》各章長短不一，連載

⁵¹ 李麗華：〈李麗華自傳〉，《今日世界》，第 46 期，頁 8-9。

⁵² 插畫者的中文名字出現在第 49 期至 52 期，刊頭註明「應如系圖」，與「張愛玲」三字直式並排，畫作的筆觸風格與前幾期雷同，而且如同初次連載起一般，圖上某處有插圖者的英文簽名（好似 YINCHAO）。自第 54 期起插圖上沒有英文簽名，畫風也顯得粗糙，帶有漫畫筆觸，可能係另一人所畫。單行本的插圖明顯減少，自第十三章起沒有插圖，全書除第三章第 44 頁的插圖沒有簽名（原為連載版第 46 期頁 24 全文結束時的補白），而且

時未必剛好於一章之末結束。以第一次刊登為例，標題下以括號註明「連載」，⁵³內容為第一章至第二章前三分之一，附有四張插圖，⁵⁴文末有「未完下期續」。⁵⁵由本文附錄一可知《秧歌》連載的情形，以及連載版十三回與單行本十七章之間的對應。⁵⁶

進一步比對連載版與單行本，發現兩者的差異有些是細枝末節，有些則為實質的改動，往往涉及與英文版的關係。這些版本差異中，以編輯修訂與標點修訂為大宗，約佔八成。編輯修訂，如訂正錯別字、異體字或排版錯誤之處，未必僅限於出版社編輯所為，也可能出自作者本人。其中，標點符號的修改如底下二例：⁵⁷

畫風不同，不知是否為他人所畫，其他皆為同一人作品。

⁵³ 張愛玲：〈秧歌〉，《今日世界》，第 44 期，頁 22。

⁵⁴ 張愛玲：〈秧歌〉，《今日世界》，第 44 期，頁 22-25。

⁵⁵ 張愛玲：〈秧歌〉，《今日世界》，第 44 期，頁 25。

⁵⁶ 1998 年美國加州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根據 1955 年紐約的 Charles Scribner's Sons 版本重印，並由王德威撰寫〈前言〉（“Foreword”），取代張愛玲 1955 年 1 月於香港為 Charles Scribner's Sons 版所寫的兩頁〈序〉，扉頁在書名與作者名底下有“A NOVEL OF MODERN CHINA”五字，參閱 Eileen Chang, *The Rice-Sprout Song*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5), v-vi 與 David Der-wei Wang, “Foreword,” in Eileen Chang, *The Rice-Sprout Song*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 1998), vii-xxv。香港的 Dragonfly Books 透過與 Charles Scribner's Sons 的安排，1963 年 6 月印行此書，1966 年 10 月二刷，兩個封面的標題底下都有“the powerful novel of China by EILEEN CHANG”八字。筆者寓目的二刷版本沒有張愛玲的〈序〉，此外三個英文版本其餘版面完全一樣。英文版第十七章前三分之二未見於中文版，高全之曾根據 1998 年版中譯，參閱高全之：〈盡在不言中：《秧歌》的神格與生機〉，《張愛玲學》，頁 162-168。

⁵⁷ 修訂之處以底線標示，下文同。感謝張力行協助比對不同版本。

「走吧，我們走吧，」金根對他妹妹說「她別這麼老腦筋。」

（連載版，「她」字為衍文）⁵⁸

「走吧！我們走吧！」金根對他妹妹說：「別這麼老腦筋。」

（單行本）⁵⁹

「不用費事了，金根嫂。都是自己人！」王同志在椅子上欠身。（連載版）⁶⁰

「不用費事了，金根嫂，都是自己人。」王同志在椅子上欠了欠身。（單行本）⁶¹

此二例中，前者把兩處逗點改為驚嘆號以加強語氣，並且在對白中補上冒號。後者將句號改為逗號，以示語氣之連貫，驚嘆號改為句號以示語氣和緩，無足驚異。「欠了」兩字也使文句更為平順。

更實質的則為文字的修潤，使其更精準有力，如底下三例：

……糊滿了油火的廚房裡走過（連載版）⁶²

……糊滿了油烟子的廚房裡走過（單行本）⁶³

但是他也有點覺得，他在這裡只有使她感到不便，也使她覺得冤。（連載版）⁶⁴

58 張愛玲：〈秧歌〉，《今日世界》，第 44 期，頁 23。

59 張愛玲：〈第一章〉，《秧歌》（香港：今日世界社，1954 年），頁 6。

60 張愛玲：〈秧歌〉，《今日世界》，第 47 期（1954 年 2 月 15 日），頁 24。

61 張愛玲：〈第四章〉，《秧歌》，頁 57。

62 張愛玲：〈秧歌〉，《今日世界》，第 45 期，頁 23。

63 張愛玲：〈第二章〉，《秧歌》，頁 24。

64 張愛玲：〈秧歌〉，《今日世界》，第 45 期，頁 23。

但是他也有點覺得，他在這裡只有使她感到不便，也使她覺得委曲。（單行本）⁶⁵

共產黨佔有大陸之後，他不但沒有升遷，反而被貼上了「趕不上形勢」的招牌紙。（連載版）⁶⁶

共產黨席捲大陸之後，他不但沒有升遷，反而被貼上了「趕不上形勢」的招牌紙。（單行本）⁶⁷

由上可見，修訂之處均為細節，顯示單行本力求用字精準，標點正確，雖然不確定是出自作者、出版社編輯，或兼而有之，但以張愛玲的作業習慣，而且當時就在香港，出版前經作者本人過目殆無疑義。尤其兼顧文字與藝術性的修訂，當出自作者本人，非編輯所能代勞，與英文版比對時更為明顯。底下為最顯著的幾個例證，為方便起見，以表格呈現：

⁶⁵ 張愛玲：〈第二章〉，《秧歌》，頁 25。

⁶⁶ 張愛玲：〈秧歌〉，《今日世界》，第 49 期（1954 年 3 月 15 日），頁 26。

⁶⁷ 張愛玲：〈第六章〉，《秧歌》，頁 90。

表一

連載版	單行本	英文版 ⁶⁸	備註
<p>「早點睡吧，金花妹，」他高聲喊著。「明天你還要走十里路。」（第 44 期，第一章，第 24 頁）</p>	<p>「早點睡吧！金花妹。」他高聲喊著。「明天你還要走十里路。」 <u>「你還沒睡？你來回要走二十里呢！」</u>（第一章第 11 頁）</p>	<p>“Better sleep early, Sister Gold Flower,” he called out. “Tomorrow you have to walk another ten <i>li</i>.” “Are n’t you asleep yet? Tomorrow you will have to walk double that distance. You have to come back.” （第一章第 10 頁）</p>	<p>補一段中文對白，比照英文版增加了對話感，使語意與情境更明晰。</p>

⁶⁸ 英文版係根據 Eileen Chang, *The Rice-Sprout Song*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5)。

連載版	單行本	英文版 ⁶⁸	備註
<p>在這一個階級，倒並不是愉快的感覺……（第45期，第二章，第23頁）</p>	<p>在這一個階段，倒並不是<u>不</u>愉快的感覺……（第二章第21頁）</p>	<p>At this stage it was not a disagreeable sensation ...（第二章第21頁）</p>	<p>將原先的「級」字更正為「段」字。增加一「不」字，改為雙重否定，修正語意，以符合情境。</p>
<p>然後金根在人叢後面站了起來，大家也就跟著劈劈拍拍一陣鼓掌。（第50期，第八章，第24頁）</p>	<p>然後金根在人叢後面站了起來，<u>說，「我提議請王同志給我們講話。」</u>大家也就跟著劈劈拍拍一陣鼓掌。（第八章第107頁）</p>	<p>Then Gold Root stood up at the back and said, “I move that we ask Comrade Wong to tell us his ideas.” The Chairman of the Farmers’ Association started to clap and after a while the people caught on and all joined in.（第八章第95頁）</p>	<p>補一句發言，使場景更明確（連載版中金根是在人叢後面，只是站起，沒有發言，其他人可能看不到他，遑論跟著鼓掌）。英文版由農會主任率先鼓掌，大家跟隨，更符合情境。</p>

連載版	單行本	英文版 ⁶⁸	備註
<p>一層層的雲擁在一起，成為一個洞窟，洞口染上一抹琥珀洞窟裡的一團濛濛的光。但是他們還沒到家，雨已經下得很大。最後一截路，大家都狂奔著。（第 50 期，第八章，第 24 頁）</p>	<p>一層層的雲擁在一起，成為一個洞窟，<u>洞口染上一抹琥珀色的光。下起毛毛雨來了。但是那月亮仍舊在那裡，琥珀洞窟裡的一團濛濛的光。</u>他們還沒到家，雨已經下得很大。最後一截路，大家都狂奔著。（第八章第 109 頁）</p>	<p>Layers of clouds formed a rocky cave with an amber glow at the rim. Then it started to drizzle. The moon was still there, a fairy light in the amber cave. But before they reached home it was raining hard and they had to run for shelter.（第八章第 97 頁）</p>	<p>補充有關毛毛雨與月亮的文字，使景像更鮮明，並預示大雨的降臨。此外，月亮在全書數度出現，具其象徵意義，有相互輝映之效。（連載版疑似手民之誤，將第一次出現的「琥珀」，誤為第二次出現的「琥珀」，而漏掉二者之間的二十三字〔含標點符號〕）</p>

連載版	單行本	英文版 ⁶⁸	備註
從這裡望下去，那棵小樹有點奇怪。映在那灰白的溪水上，那樹榭叉裡彷彿夾著個鳥巢，但是那鳥巢太大了，位置也太低。（第55期，第十四章，第26頁）	從這裡望下去，那棵樹有點奇怪。映在那灰白的溪水上， <u>那小樹的黑色的輪廓</u> 可以看得很清楚。樹榭叉裡彷彿夾著個鳥巢，但是那鳥巢太大了，位置也太低。（第十四章第188頁）	There was something odd about that small tree outlined against the gray pallor of the water. What seemed to be a large bird's nest nestling in its forked branches was too big, and far too low.（第十四章第160頁）	增加形容，使景色更明晰。

由上表所舉的例子可知，相較於連載版，單行本「後出轉精」，然而此處所謂的「後出」，究竟是因為參照「先前」就有的英文稿「補回」，以期更精緻細膩？還是中文單行本之後出版的英文版（張愛玲的英文序所署日期比中文單行本晚半年），在作者的中英自譯／譯寫過程中添加的？除非找到原初的英文稿本，否則恐難定論，然而前者的可能性似乎較高。

《秧歌》連載時，張愛玲已在美新處旗下的出版社出版了三本譯作（十九世紀經典作家歐文，二十世紀當代作家海明威與勞林斯〔Marjorie Kinnan Rawlings〕，詳下文）。不同於那些由出版社主

導的譯作，《秧歌》是她個人提出而在美新處贊助下完成的小說，儘管經過英中自譯／譯寫的過程，但實際的出版計畫翔實，流程明快，而且交給《今日世界》的連載稿可說就是定稿。⁶⁹《秧歌》於 1 月 1 日開始連載，十三期刊完，依原規劃立即出版單行本（適逢暑假期間）。該版本有作者四頁的〈跋〉（雖於書末，頁碼卻是 1-4）。1955 年皇冠版的《秧歌》除了保留原先的〈跋〉之外，⁷⁰特地在扉頁前加了一頁胡適的手迹，稱讚「此書從頭到尾，寫的是『飢餓』——書名大可以題作『餓』字——寫的真細緻，忠厚，可以說是寫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我讀的中國文藝作品，此書當然是最好的了」。⁷¹雖然簡短，但對於主題、風格、呈現與評價，發揮了很大的定調作用。⁷²

透過《今日世界》的《秧歌》連載版，我們得以追本溯源，回到張愛玲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本小說最早問世時的面貌，其置身的期刊脈絡，多少領會第一批讀者閱讀這部小說時的情境與體驗。藉由

⁶⁹ 這點很可能來自先前在上海連載《十八春》的經驗，她曾提到：「《十八春》在報上一邊登，一邊寫，寫到後來，明明發現前面有了漏洞，而無法修補，心上老是有個疙瘩。」參閱張惠苑編：《張愛玲年譜》，頁 77。

⁷⁰ 1955 年皇冠版〈跋〉刪去最後一段向原書封面設計者薛志英的致謝，封面改由夏祖明設計，很可能因為原封面採用扭秧歌的圖案，有違中華民國的反共國策。

⁷¹ 張愛玲：《秧歌》（臺北：皇冠，1955 年）。

⁷² 「平淡而近自然」其實是張愛玲給胡適的信中，表示自己目標之所在，而胡適顯然肯定她的說法。參閱張愛玲：〈憶胡適之〉，《張看》（臺北：皇冠，1976 年），頁 163-178。今（2020）年 4 月出版的張愛玲百歲誕辰紀念全新增訂版，扉頁依然是胡適這段文字，並加上「編註：出自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五日胡適給張愛玲的信」，可參閱張愛玲：《秧歌》，張愛玲百歲誕辰紀念全新增訂版（臺北：皇冠，2020 年），扉頁。

這種溯本的方式，把《秧歌》帶回到原初的脈絡與情境，以了解張愛玲如何在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帶頭的對峙形勢下，在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後，繼續追逐中英文創作之夢，並堅持自己的藝術要求，不因接受贊助而屈從於贊助者的意識形態。這也襯托出美新處的靈活彈性，對自由的身體力行，以及對自家軟實力的信心。⁷³ 再就作家個人而言，張愛玲並非對政治無知，而是有著文人的敏銳、觀察與體驗，以致為了尋求更包容、友善的生活環境與創作空間，下定決心離開中共統治下的上海，來到香港，即便接受美新處的贊助，也不致在寫作時為了服膺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犧牲自己的藝術標準與文學理想，因而保全了作家與作品的真誠（integrity）與風格，長久而言使得作家與贊助者都成為贏家。⁷⁴

三、《今日世界》中有關張愛玲的評論

（一）小說評論

綜觀《今日世界》上與張愛玲相關之處，除了小說連載之外，就是有關她的書評。該刊設定的對象為華文世界一般讀者，文字與

⁷³ 這種情形也出現於美新處對待今日世界出版社華籍職員的態度，參閱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翻譯與脈絡》修訂版，頁 132-133，註 22。

⁷⁴ 如陳建忠便指出即使是委託之作，「書寫權力依然是操之在我的」，不宜忽略「作家的相對自主性」，而張愛玲在香港「『有可能』寫出了當時最具個人特色，也最成功，有關反思共產黨與知識分子、農民關係的反共小說」，參閱陳建忠：〈「流亡」在香港——重讀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島嶼風聲：冷戰氛圍下的臺灣文學及其外》（新北市：南十字星，2018年），頁 233、230。

內容力求平易近人，以期效應的極大化。早期較少正式書評，多為簡短的書訊，後來出現評介文章，介紹香港和臺灣的書籍，第 507 期改版後大都集中於今日世界出版社的作品，重點在於宣揚美國文化，反對共產主義。書評限於一頁，力求言簡意賅，普及通俗。

《今日世界》固然以十三期連載張愛玲的小說創作，但涉及她的十篇書評或介紹，除了最早的桑簡流的〈赤地之戀〉，其他都集中於譯者張愛玲，而這些譯作或合譯都由香港美新處資助的出版社印行。桑簡流的書評出現於 1954 年 11 月 15 日第 65 期。文前依照其書評體例提供《赤地之戀》的封面與出版資料：天風出版社印行，定價港幣二元五角。桑簡流的生平有些傳奇性。董橋在〈《夜望》自序〉中提到，桑簡流為他在英國廣播電臺的前輩，「原名水建彤，早年玩票拍過電影……出身世家，外公是近代藏書大家傅增湘……桑先生從小熟悉中國文化典籍，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主修歷史和國際法……一輩子研究《水經注》和黃河史，《西遊散墨》之外還寫過《伊帕爾罕詩劇》和《香妃》，翻譯《惠特曼選集》和梭羅的《湖濱散記》。五十年代在香港教書，六十年代定居英國。」⁷⁵ 由此可知此人出身世家，集文史、國際法、寫作、翻譯、電影、教學、廣播於一身，背景與張愛玲有不少相似之處。

《赤地之戀》1954 年 10 月由天風出版社出版，因此桑文為此書最早的評論之一，全文雖然篇幅簡短，並有近四分之一引用原著以示其精采，但提綱挈領，指出幾個要點。首先說明此書口碑甚佳，

⁷⁵ 董橋：〈《夜望》自序〉，《蘋果日報》，<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apple/daily/article/20131110/18500737>（瀏覽日期：2020 年 7 月 21 日）。此人曾以本名在《今日世界》發表〈水經注與胡適〉（第 4 期頁 12），也曾於《秧歌》連載期間以桑簡流筆名發表〈農民總統——林肯〉（第 46 期頁 6-7）。

作者出於好奇，買來閱讀之後，斷言比他「聽到的、想像到的更好。看過的人沒有一個不說，這是反共小說最好的一部」。⁷⁶就技術面而言，評者指出此書「活像一部電影」，透過主角劉荃眼中看到「書中的種種情節」，「作者照實寫下來」，讓讀者有如親臨現場，並認為「這種寫法是一個新嘗試」。透過閱歷豐富、別具隻眼的主角眼光，讀者可以從「作者的字裡行間，真真切切地看到一切真相」。另一特色便是「談話的藝術」，掌握了不同身分、地位的角色之口語，因而「開了先河」（〈赤地〉，頁11）。

評者認為此書之所以傑出，絕非偶然，關鍵在於「兩點要素：（一）苦心收集資料。（二）憑豐富的學識編排這些素材」。評者進一步指出，「作者苦心收集別人的材料，憑自己對文學、心理學、民俗學、戲劇電影、新聞學的根底，再利用自己練熟了的寫作技巧，才融會組成這一部小說。」（〈赤地〉，頁11）因此，評者斷言《赤地之戀》「是一部刻畫時代痕跡的作品，暴政的實錄，雖是小說，也是史實」。書中「信手拈來的絕妙比喻，有意境，有象徵，隱射暴政之不久」，引用三例，表示有如詩的效果，並稱譽「這是一部史詩」。然而評者固然肯定「作者手法很新。意境高，而平易近人。又善用短句、反問句，活潑有力」，但也指出「全書後半部較鬆」，有些比喻太過，「略嫌犯了『意境蔽』」，卻又說「這種寫法，給文藝愛好者和寫作者很多啟發」。結語表示，「這部作品大大值得看，值得想，值得研究。」（〈赤地〉，頁11）

此篇書評雖然短小，但頗有見地，在《赤地之戀》問世之際，

⁷⁶ 桑簡流：〈赤地之戀〉，《今日世界》，第65期（1954年11月15日），頁11。為行文簡潔之便，有關此文後續引文將以（〈赤地〉，頁碼）之形式直接註明。

就能明確指出作者與全書的特色，提供精準的評斷。首先是定位本書不僅為反共小說，而且是當時盛行的這類小說中「最好的一部」（〈赤地〉，頁 11）。其次指出張愛玲的準備工夫，包括資料的蒐集與整備，編排的學問與方式，融合多方面的根底。再者就是彰顯作者的寫作技巧與特色，包括電影手法、敘事觀點、口語藝術、詩的譬喻，結果便是成就了一部刻劃「時代痕跡」、「暴政的實錄」、「隱射暴政之不久」的史詩之作（〈赤地〉，頁 11）。直到今日有關此書的許多探討仍然不脫上述方向，見證了《赤地之戀》的豐富內涵與歷久彌新，以及此篇書評的立論經得起考驗。

置於當時的國際局勢與文化生產脈絡，天風出版社為美援文藝體制贊助的機構之一。此篇書評刊登於同一體制下的《今日世界》，深入淺出，要言不煩，對張愛玲接受美新處委託所撰寫的反共小說，在內容與藝術層面給予高度肯定，多方引用原文以支持其論點，也指出手法上值得商榷之處，然而小疵不掩大瑜，肯定作者多方用功，蒐集資料，編排整理，結合史實與藝術，為時代作見證。全文寫來舉重若輕，言之有物，大褒小貶，其「史詩」與「最好的反共小說」之說可能仁智互見，但足見當時最具代表性的華文反共刊物對《赤地之戀》的定位與評斷。⁷⁷

⁷⁷ 多年後，宋淇在 1976 年 4 月 28 日致張愛玲的長信中，討論修訂《小團圓》及暫緩出版時，提到她當時在臺灣之所以成為偶像，其中「官方最近 realize 你是第一個反共作家更是一個有利的因素」，參閱宋以朗：〈《小團圓》前言〉，張愛玲著：《小團圓》（臺北：皇冠，2009 年），頁 12。雖然從上下文看不出「最近」確切是何時，為何此時才認定，以及「第一個」是何根據，但更印證了張愛玲予人「反共作家」的印象。

（二）獨譯評論：《鹿苑長春》、《愛默森文選》

張愛玲在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的譯作中有獨譯與合譯之作，雖然並非旗下最多產的譯者，卻是文名最盛者之一。《今日世界》有關張愛玲譯作的九篇評介中，兩篇介紹她獨譯之作，六篇討論合譯之作，一篇為比較研究（詳附錄二），其中八篇為一頁，最早那篇桑簡流的譯評介於書訊與評介之間，篇幅更少。兩篇有關其獨譯之作的介紹為 1962 年 9 月王敬義的〈一本百讀不厭的好小說：介紹「鹿苑長春」〉與 1964 年 3 月黎裕漢的〈介紹「愛默森文選」：一部啟迪你的思想的好書〉，卻獨缺更有名的張譯《老人與海》的評介，可能因為該書已風行中文世界，無需多加推介。前者為二十世紀女作家勞林斯的長篇小說《鹿苑長春》（*The Yearling*），後者為十九世紀美國超越主義代表人物愛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的文選。兩書於《老人與海》（1952 年中一出版社）次年問世，均由天風出版社印行（天風版名為《小鹿》、《愛默森選集》），可見張愛玲當時譯事之勤。此三書於 1962 年改由今日世界社／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⁷⁸

⁷⁸ 張學研究者以往的認知為張愛玲在香港期間翻譯、出版了這三本書及其他譯作，可見她勤於翻譯。然而吳邦謀與陳子善近期發現尚有遺珠。吳邦謀在〈從「張愛珍」到「愛珍」〉一文中，根據相關資料與單行本的版權頁，指出張愛玲在這段期間曾翻譯比齊（Edward L. Beach）的《海底長征記》（*Submarine*），先以本名、後以「張愛珍」自 1954 年 5 月 6 日起，於香港《中南日報》「綜合版『中南海』」連續連載，將及三閱月。全文長逾 12 萬字，譯筆簡潔流暢，深受讀者歡迎」（〈卷首語〉轉引自吳邦謀：《尋覓張愛玲》（香港：商務，2020 年），頁 253），八月《中南日報》發行單行本時，應張愛玲要求，譯者名改為「愛珍」，以避免讀者由「張愛珍」推測譯者

為了達到推廣的目的，兩篇文章都定位為「介紹」，但採取不同手法。《鹿苑長春》於 1938 年出版，普受好評，次年獲得普立茲獎，但作者勞林斯在華文世界並非那麼有名，因此介紹就以故事內容與人物為主，只在倒數第二段提到此書結合了「拓荒者生涯」（如凱塞〔Willa Cather〕）與「荒僻地區兒童的寂寞」（如朱維特〔Sarah O. Jewett〕）的題材，而勞林斯的才華與功力不遑多讓，進而肯定此書「誠然是一本堪稱不朽的小說」，也是「一篇詩，一本談論佛洛利達州的自然史」。⁷⁹ 至於以思想聞名的愛默森，介紹文章開宗明義指出，其作品不僅是「美國的自由傳統的一部份，而且已經成為世界性的文化遺產」。⁸⁰ 全文介紹他的生平、著作與思想，特別提到其說法與孟子相近之處，並指出「他極力提倡個人的價值，

為「張愛玲」。陳子善於近作〈與大海續「緣」——張愛玲譯《冰洋四傑》（部分）的發現〉中，根據 1953 年 10、11 月五份不連續的《中南日報》，指出張愛玲曾以本名「節譯和摘譯」（陳子善：〈與大海續「緣」——張愛玲譯《冰洋四傑》（部分）的發現〉，《明報月刊》，第 657 期（2020 年 9 月），頁 64）佛蘭西斯·桑頓（Francis Beauchesne Thornton）的《冰洋四傑》（*Sea of Glory: The Magnificent Story of Four Chaplains*），自 1953 年 10 月 11 日起於《中南日報》連載，前後約一個月，「應是張愛玲在香港繼《老人與海》、《小鹿》之後公開發表的第三部譯作」（陳子善：〈與大海續「緣」——張愛玲譯《冰洋四傑》（部分）的發現〉，《明報月刊》，頁 68）。兩本譯作都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美軍海戰，標榜忠勇愛國、犧牲奉獻的精神。因此，張愛玲在這段期間對於翻譯的投入，超過研究者先前的認知。至於這兩本譯作為何未如其他三本書由今日世界出版社重新印行，有待進一步探究。

⁷⁹ 王敬義：〈一本百讀不厭的好小說：介紹「鹿苑長春」〉，《今日世界》，第 252 期（1962 年 9 月 16 日），頁 27。

⁸⁰ 黎裕漢：〈介紹「愛默森文選」：一部啟迪你的思想的好書〉，《今日世界》，第 287 期（1964 年 3 月 1 日），頁 24。

和中國儒家思想可以相通，中國人讀他的東西，也許特別能得益。」由此可見介紹者有意強調中美思想相通之處，希望讀者能觸類旁通，並暗批共產黨的集權主義。

遺憾的是，即使面對的是張愛玲獨譯之作，介紹者在文中甚少提及譯者，遑論評析譯文。王文只在首尾兩段提及譯者：開頭是「病中讀完張愛玲女士譯的《鹿苑長春》」；結尾稱讚原作傑出，而「張愛玲女士的譯文也清新可喜，它絲毫沒有減去原著的光采。在缺乏優良的讀物的今天，像《鹿苑長春》這一類的書，真應該多逐譯一些。」⁸¹至於署名「黎裕漢」的那篇介紹則事有蹊蹺。此名根據考證「實為李如桐、余也魯、韓迪厚三位譯者的聯合筆名」，⁸²通篇介紹愛默森，只在末段交代原書出處與中譯本情形，完全不提譯者，對於譯文更無半字褒貶。甚至雜誌的版面設計也未如前書般於書影外另列作者、譯者、出版社與定價，以致譯者張愛玲只是書影上難以辨讀的渺小三字，其他地方完全不見蹤影。進一步查證與比對赫然發現，該文其實是張愛玲為此書所寫的〈譯者序〉，⁸³也曾出現於夏濟安編譯的《美國散文選（上冊）》。⁸⁴換言之，這篇介紹係

⁸¹ 根據當時的格式，篇名、引文中的引文或強調都用單引號，書名也用單引號或如今廢棄不用的波浪式書名號。為了避免混淆，本文將引文中書名與篇名的標點符號，分別改為現行的雙尖號與單尖號，原文的強調用雙引號，英文書名則由正體改為斜體。

⁸² 參閱賴慈芸、張思婷：〈追本溯源——一個進行中的翻譯書目計畫〉，《編譯論叢》，第4卷2期（2011年），頁179，註16。

⁸³ 張愛玲：〈譯者序〉，《愛默森文選》（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62），頁1-4。

⁸⁴ 夏濟安選編，夏濟安、張愛玲譯：《美國散文選（上集）》（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58年），頁83-86。後來也出現於林以亮編《美國詩選》，頁1-4與皇冠版《愛默森選集》，頁3-6。

挪用譯者張愛玲的序言，卻冠上三人的聯合筆名，實有一魚兩吃、魚目混珠之嫌。至於究竟為何如此？張愛玲本人反應又如何？都不得而知。猜測可能是除了張愛玲本身的譯作之外，在雜誌上用另一種方式呈現，以期達到壯聲勢、招廣徠之效。然而對譯者而言，不僅自己的譯作未得到公允對待，連譯者為譯作親撰的附文本（序言）也遭到剝奪，冠以他人名義，可說是對譯者的雙重傷害。這種作法或許為了避免標明是張序而予人舊文重刊之感，也或許為了避免該出版社其他譯者要求比照辦理的困擾，否則實難想像以文明先進自居、尊重原作版權的美新處旗下的指標性刊物，竟以這種方式處理旗下已有相當知名度的張愛玲的譯作。⁸⁵ 如此一來，原本可以堂而皇之使用張愛玲的〈譯者序〉，把譯者推到臺前，但選擇的手法不但使譯者隱形，更剝奪其文字所有權。這種便宜行事的作法其實對涉及的各方均不利，而且唯有透過考掘《今日世界》雜誌才得以揭露，讓譯介者的沉冤得以洗雪。

（三）合譯評論：《無頭騎士》、《睡谷故事》

有意思的是，張愛玲翻譯歐文的〈無頭騎士〉（Washington Irving, “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與方馨、湯新楣翻譯歐文的其他作品，卻為因應不同版本的問世，而出現於三篇書評中，得到異乎尋常的曝光率，甚至可能予人「一魚多吃」之感（詳附錄二）。⁸⁶

⁸⁵ 除了在公共領域（public domain）、沒有版權之虞的原作之外，今日世界（出版）社一般在翻譯之前都會先取得版權，並在版權頁註明。當時華文世界盜版猖獗，如此作為有如空谷足音，示範了對智慧財產權的尊重。也因此特別令人訝異《今日世界》對這篇〈譯者序〉的處理方式。

⁸⁶ 方馨為鄭文美的筆名，湯新楣則為今日世界出版社最多產的譯者。張愛玲

簡言之，張愛玲雖只譯過一篇歐文的作品，但因作者在美國文學史上的代表地位，作品本身的故事性與吸引力，以及該故事在中文世界的流傳史（林以亮〈前言〉開宗明義就提到），使得此篇譯作得到今日（世界）出版社的青睞，以不同包裝三度問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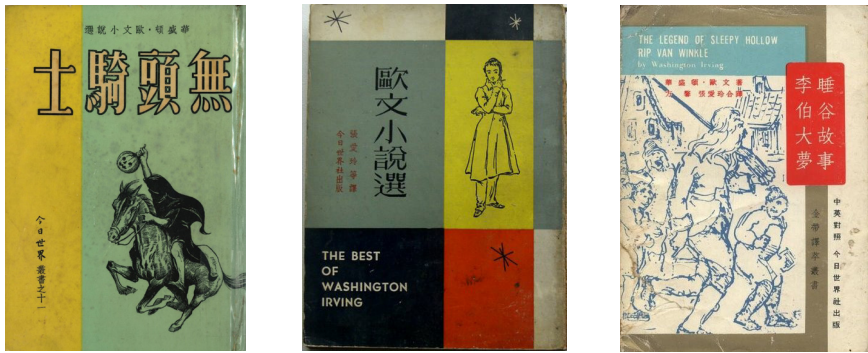
1955年今日世界社出版的《無頭騎士》為「今日世界叢書之十一」，共收錄十篇譯作以及林以亮的〈前言〉，並附錄林以亮的〈關於〈李伯大夢〉〉。⁸⁷ 十篇譯作中，張愛玲、方馨、湯新楣分別譯了一篇、四篇、五篇，但書評列出的書目資料中譯者依序為張、方、湯，把譯了一半份量的湯新楣置於最末。不僅如此，該書封面配以「無頭騎士」四個大字（幾乎比上排那行「華盛頓·歐文小說選」大上十倍），以及一個手提頭顱（南瓜）的騎士插圖，張譯為〈前言〉後的第一篇，在在看得出對張愛玲格外禮遇。⁸⁸ 此書於1962年10月改裝出版，內文沒有更動，但易名為《歐文小說選》，加上英文標題“THE BEST OF WASHINGTON IRVING”，封面為歐文的立姿素描，較前書的呈現更為忠實貼切，但註明「張愛玲等

曾譯新批評大師華倫（Robert Penn Warren）的長文〈論《戰地春夢》〉，參閱張愛玲譯：〈論《戰地春夢》〉，海明威著，湯新楣譯：《戰地春夢》（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0年），頁1-38，其後為林以亮的〈介紹《戰地春夢》的新譯〉以及湯新楣的譯文，可參閱林以亮：〈介紹《戰地春夢》的新譯〉，海明威著，湯新楣譯：《戰地春夢》，頁39-54。金炳興的〈談「戰地春夢」〉集中於海明威的小說本身，只提到湯譯「算是最忠實、最傳神的譯本」，並未提到張譯與林文這兩篇很有份量的附文本。金炳興：〈談「戰地春夢」〉，《今日世界》，第488期（1972年7月16日），頁36。

⁸⁷ 林以亮：〈前言〉，收入歐文著，張愛玲等譯：《歐文小說選》（香港：今日世界社，1963年），頁1-20。

⁸⁸ 林以亮：〈附錄：關於〈李伯大夢〉〉，收入歐文著，張愛玲等譯：《歐文小說選》（香港：今日世界社，1955年），頁269-290。

譯」。⁸⁹ 1967 年，該社精選兩篇，把張譯篇名改為直譯的〈睡谷故事〉，與方馨譯的〈李伯大夢〉合為一冊，以荷槍的李伯為封面，以雙語對照的方式出版《睡谷故事／李伯大夢》（*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 / Rip Van Winkle*）。⁹⁰ 這三個不同版本前後相隔十二年，問世時《今日世界》都搭配書評，以招廣徠。



圖二、張譯歐文小說以不同形式包裝發行（左圖由樊善標老師提供）

這三篇介紹文章各有特色，作者分別為桑簡流、薩滿義、康俠，⁹¹ 頭一篇只有半頁，名為「書評」，其他兩篇為整頁，名為「介紹」。桑簡流的〈無頭騎士〉刊登於 1955 年元旦的《今日世界》，距離他的《赤地之戀》書評僅一個半月。今日世界社該年出版《無頭騎士》，可見有別於先前評論的《赤地之戀》是在聽聞口碑之後自行購買，此中譯應係上市前便從出版社取得，事先作業，才趕得

⁸⁹ 張愛玲、方馨、湯新楣合譯：《歐文小說選》（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62）。

⁹⁰ 張愛玲、方馨譯：《睡谷故事·李伯大夢》（香港：今日世界社，1971 年）。

⁹¹ 後者在目錄頁為「唐俠」。鄭樹森回應筆者電郵詢問時表示，「康俠應是王敬義。不是唐。唐或是手民之誤。」鄭樹森：致作者電郵，2020 年 8 月 12 日。

及在該年第一期刊出。⁹² 桑文言簡意賅，觸及諸多面向，以幽默諷刺來定位歐文的作品，並提到全書的十篇小說（與中國文學的《聊齋》與《儒林外史》相提）以及林以亮的兩篇附文本。值得一提的是他對譯者的重視，不僅開宗明義指出「這本幽默短篇小說，是翻譯文學的里程碑。三位譯者，用純粹的中文，譯出美國文壇一塊里程碑——美國最初的西部小說」，肯定他們「使翻譯文學步入一個新境界——更接近自然，更引人入勝」；結尾更盛讚譯文「能不走一字，天衣無縫，不但和原作一樣，並且青出於藍，實在可喜可賀！」可謂是對翻譯的最高揄揚。不僅如此，文中稱讚「三位譯者既有根底，又苦心用功，對臺比賽翻譯」，較勁的成果則是「值得讀之再四的國語讀本」、「是自修英文時最好的中文對照本。與原文對照，更見得這本譯本的高明。」此文即使篇幅短小，依然舉三位譯者的文字為例，以示譯文「妙語如珠」，對翻譯與譯者的評論超過一半。儘管《無頭騎士》只收錄張愛玲一篇譯作，但這篇短文卻是對張譯的評論中最重視翻譯且肯定譯者的一篇。

薩滿義的取徑則截然不同。文中提到「本港今日世界社最近出版了一本《歐文小說選》，雖說是『小說選』，內容卻不只限於小說，它還包括一些速寫同小品文」。此說法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便是對內容的說明，以及對書名的修訂或補充，以示內文不限於小說；其次是有誤導之嫌，因為《歐文小說選》雖是「最近出版」，但內容卻與先前的《無頭騎士》一樣，只能說是「新瓶舊酒」，連定價都維持港幣二元。在十篇譯作中，論者特別談論〈李伯大夢〉與〈無頭騎士〉：前者提到該故事在中文世界的流傳史（曾有林琴南與傅

⁹² 桑簡流：〈無頭騎士〉，《今日世界》第68期（1955年1月1日），頁26。

東華的譯本），以及在美國的接受史；後者則溯源，指出〈無頭騎士〉雖然借自德國已有的故事，卻能借古而創新，成就歐文為「偉大的文體家」以及「美國第一位『經典作家』」之地位。⁹³

此書評對林以亮的附文本特別重視，佔了九段文字中的三分之一，份量之重前所未見。因此，若說林之附文本是為了闡釋歐文及其作品的重要性，那麼薩文則是在闡明林文作為譯作附文本的重要性，包括附錄中逐譯的美國批評家代氏（A. G. Day）對〈李伯大夢〉的評論，來示範如何以新批評的方法來閱讀文學作品。⁹⁴ 對林以亮的文學志業略有認識的人便知，這結合了他對文學、翻譯與文學批評的興趣，以及引介新批評的努力。⁹⁵ 弔詭的是，此文對附文本的重視竟遠超過譯者與譯作——對譯者隻字未提，對譯作的評價也只寥寥兩句：「這本『小說選』，選的精，譯的也好。說譯文『乾淨流利』，絕非過譽。」相較於對附文本的鋪陳與討論，譯文與譯

⁹³ 薩滿義：〈一本需要細嚼的書——介紹「歐文小說選」〉，《今日世界》，第 260 期（1963 年 1 月 16 日），頁 18。

⁹⁴ 薩滿義：〈一本需要細嚼的書——介紹「歐文小說選」〉，《今日世界》，第 260 期，頁 18。

⁹⁵ 在林以亮與夏志清的合作下，翻譯、出版了《美國文學批評選》（香港：今日世界社，1961）。此書由林以亮編選，選文主要出自夏志清的推薦，夏濟安、梁實秋、陳文湧、思果、夏志清、余光中、方馨、唐文冰（林以亮）、張愛玲、吳魯芹合譯。附帶一提的是，鄭樹森在〈夏公與「張學」〉中提到夏志清對「張學」的貢獻以及對張愛玲的六個論點，第一個便是他採用貼近「形式主義苦讀細品、就文論文的方法」，參閱鄭樹森：〈夏公與「張學」〉，《從諾貝爾到張愛玲》（臺北：印刻，2007 年），頁 243。該文〈附記〉特別說明夏志清與新批評的淵源，以及其研究手法除了新批評，還酌採作者生平資料與比較文學的角度，參閱鄭樹森：〈夏公與「張學」〉，《從諾貝爾到張愛玲》（臺北：印刻，2007 年），頁 244-246。

者遭到如此冷落，不免讓人有些意外。然而就當時中文世界譯介外國文學的情況而言，文本翻譯為一般模式，有深度的評介較為罕見，與市面上的文學翻譯相較，林以亮的評介反而是此書的亮點，難怪獲得書評者的青睞。⁹⁶

1967年，歐文的譯作重新包裝上市，作為「金帶譯萃叢書」，扉頁註明今日世界出版社，但封面與版權頁則為今日世界社，可見出版者對兩種名稱還舉棋不定。此次的主要改動有三項：一是由原先十篇縮為兩篇；二是張譯篇名由「無頭騎士」改為直譯的「睡谷故事」；三是全書改為「中英對照」（內文編排英文在左、中文在右，嚴格說來是「英漢對照」），書名隨之改為《睡谷故事／李伯大夢》，並附上英文書名及作者名。該書封底介紹此二篇為歐文「最著名的代表作」，而英漢對照的編排是為了「讓讀者在欣賞名作之餘，藉以學習英文。同時，譯文出自名家手筆，細加觀賞，對練習翻譯亦有幫助。」⁹⁷如此作法顯然呼應先前評論對譯文的肯定，並試圖以英漢對照的版本開拓另一群讀者，發揮更大的影響。

康俠的書評介紹歐文的才情與個性，表示其作品取材兼具當代與「民俗史乘」，而此兩篇「就都含有濃重的傳說和神話的成份」。⁹⁸有趣的是，在介紹張譯的〈睡谷故事〉時，提到對時空背景與風俗的精確描述，如先前介紹張譯《鹿苑長春》時一樣提到凱瑟〔凱

⁹⁶ 由於當時資訊傳播不便，就筆者閱讀該系列的親身經驗，確實從這些相關的附文本中獲得許多有關作家、作品、文學史以及文學鑑賞的重要資訊，為當時傳播美國文學與文化相關訊息的重要管道。

⁹⁷ 張愛玲、方馨譯：《睡谷故事·李伯大夢》（香港：今日世界社，1971年），封底。

⁹⁸ 康俠：〈介紹一本中英對照歐文小說集：「睡谷故事」與「李伯大夢」〉，《今日世界》，第366期（1967年6月16日），頁23。

塞〕，而在討論〈李伯大夢〉時，則逕以「寓言」稱之，並與梅爾維爾的《白鯨記》、馬克·吐溫的《哈克歷險記》並論，認為「同是意義豐富的寓言。」由於本書是中英對照，翻譯勢必非提不可，因此文末引用堪利夫（Marcus Cunliffe）之說，⁹⁹ 強調歐文「以一種流暢而莊嚴的文體超越了他的英國的模型」，而要將此文體「完整的見之於中譯，是張愛玲與方馨兩位女士所完成的一件極艱巨、極了不起的工作。很多詼諧的句子，很多有景物的描寫，中文讀起來依然是那樣生動活潑。」¹⁰⁰ 結尾強調此書的特色與作用：「想為自己英文紮一個根底的讀者，真應把這本中英對照的歐文的小說集列為必讀書才是。」¹⁰¹

由此可見，歐文在美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使得他成為出版社與雜誌社推介的重點，短篇小說由於故事性高，篇幅短小，成為最方便譯介與吸引讀者的文本。張愛玲在香港從事翻譯，使得她在原本的作家聲望上更逐漸累積了譯者的名氣。即使她的歐文譯作只有一篇，但是排名與文宣卻在另兩位譯者之前，可謂極盡禮遇之能

⁹⁹ 堪利夫為英國學者，所撰《美國的文學》（*The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由臺灣學者張芳杰中譯，1957年由臺北的東方出版社出版，1963年由今日世界社出版，是少數先在臺灣出版、再在香港出版的譯作。此書書評參閱思果：〈「美國的文學」讀後〉，《今日世界》，第142期（1958年2月16日），頁23。相關背景參閱單德興：〈冷戰·文學·傳播——《今日世界》與美國文學在華文世界的傳播〉，收入王安琪、張上冠編：《文化傳承：文學與語言——袁鶴翔講座教授八秩晉五榮退紀念文集》，頁66-68。

¹⁰⁰ 康俠：〈介紹一本中英對照歐文小說集：「睡谷故事」與「李伯大夢」〉，《今日世界》，第366期，頁23。

¹⁰¹ 康俠：〈介紹一本中英對照歐文小說集：「睡谷故事」與「李伯大夢」〉，《今日世界》，第366期，頁23。

事。而且出版社藉由不同的包裝，把訴求對象由原先的純中文讀者，擴展到有意研習英文與翻譯的對象，並透過不同評論者三番兩次在《今日世界》發表文章，推介同一旗下的出版品。凡此種種可視為多重經營、分進合擊的出版策略，這些固然都涉及當時的國際局勢、時代氛圍、文化政策與執行措施，然而也為當時的華文世界引介了美國經典作家與文學作品，擴大了讀者的閱讀範圍與鑑賞能力。

(四) 合譯評論：《美國散文選（上集）》、 《美國詩選》、《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

以下三篇書評分別介紹張愛玲與人合譯的其他文類作品：《美國散文選（上集）》（1958，與夏濟安合譯）、《美國詩選》（1961，與林以亮、余光中、邢光祖等合譯）、《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1967，與林以亮、於梨華、葉珊合譯）——¹⁰²後兩本為張愛玲到美國後的譯作，當時她在異國謀生不易，主動要求翻譯以改善生計。¹⁰³這些譯作試圖從散文、詩歌、小說、評論等角度多方推介美

¹⁰² 參閱幸明：〈美國散文選（上集）〉，《今日世界》，第160期（1958年11月16日），頁20；思果：〈介紹「美國詩選」〉，《今日世界》，第241期（1962年4月1日），頁24；薩滿義：〈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今日世界》，第372期（1967年9月16日），頁36。第160期目錄顯示該篇作者為「幸明」，但內文未並具名，為行文方便，以下以「幸明」稱呼。

¹⁰³ 如她在給夏志清信中的說法，與先前在香港時厭惡翻譯的態度大相逕庭：「我對翻譯很有興趣，預備在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 領點政治性的東西來譯，但是他們根據學位給錢，而我連大學都沒讀完」。夏志清在按語裡說明，「愛玲在改寫小說期間，電影劇本也不寫了，只好靠翻譯工作來維持生活」。而張愛玲在信中也向夏志清透露，「我喜歡翻譯也是

國文學與文化，三篇書評也希望發揮推波助瀾的效果，然而從再現張愛玲的角度來看，卻可能有些誤導。¹⁰⁴

幸明在文章伊始提到，「最近讀完夏濟安張愛玲二先生編譯的《美國散文選》，覺得該書優點很多，勇敢向愛好文學及研究美國問題的讀者推薦」，接著列出此書六點特色，最後一點針對文學翻譯：「翻譯文藝作品尤其不容易討好。因為除忠實流暢外且要能傳神。」¹⁰⁵ 接著評論兩人譯文：「夏張二先生對文章造詣頗深，而且極富寫作經驗，對此自然遊刃有餘。本書譯筆清暢可讀，初習譯作者可用作範本。」¹⁰⁶ 這些描述以及書評所附的出版資料（「夏濟安選編」，「夏濟安張愛玲譯」）讓人誤以為兩人的貢獻相當，至少相去不遠。然而查閱該書便會發現其實只收錄了張譯愛默森的〈梭羅〉一文，並在作者愛默森的介紹中提到：「香港天風出版社有一部《愛默森選集》係張愛玲女士根據馬克·范道倫（Mark Van Dore[n]）的選本（*The Portable Emerson*）選譯而成。本集中〈梭羅〉（Thoreau）一文，譯文全用張譯，特此向張女士致謝。（本篇介紹也大部錄用張女士那本書的〈譯者序〉，一併致謝）」。¹⁰⁷ 上述

因為是機械化的工作，不妨礙寫作」。參閱夏志清編註：《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臺北：聯合文學，2013年），頁15、17、26。

¹⁰⁴ 從推廣美國文學的角度來看待這些評介文章，參閱單德興：〈冷戰·文學·傳播——《今日世界》與美國文學在華文世界的傳播〉，收入王安琪、張上冠編：《文化傳承：文學與語言——袁鶴翔講座教授八秩晉五榮退紀念文集》，頁64-76。

¹⁰⁵ 參閱幸明：〈美國散文選（上集）〉，《今日世界》，第160期，頁20。

¹⁰⁶ 參閱幸明：〈美國散文選（上集）〉，《今日世界》，第160期，頁20。

¹⁰⁷ 夏濟安選編，夏濟安、張愛玲譯：《美國散文選（上集）》（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58年），頁85。

文字沒出現在該書〈編者序〉，¹⁰⁸ 而是夾在愛默森的介紹中；¹⁰⁹ 譯者名字沒出現在目錄頁的篇名下方，而是在內文標題之下。這些編排方式以及此篇書評的寫法，對只收錄一篇譯作的張愛玲來說都是「呈現過度」（overrepresentation）。¹¹⁰

對張愛玲的過度呈現同樣出現於 1961 年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美國詩選》。此書由林以亮編選，收錄十九世紀以降的美國詩人 17 位，詩作 110 首，依年代順序排列，封面與版權頁列出的四位譯者依序為張愛玲、林以亮、余光中、邢光祖。筆者在〈在冷戰的年代〉一文中指出，譯者中以余光中最年輕，「卻譯了五十一首詩（相當於 46%），並撰文介紹十一位作家（相當於 65%），分量約為全書的一半，是實質貢獻最多的譯者與撰文者」。¹¹¹ 林以亮則譯了三十五首詩，撰寫四位作家的生平和著作介紹。質言之，《美國詩選》中，

¹⁰⁸ 夏濟安選編，夏濟安、張愛玲譯：〈編者序〉，《美國散文選（上集）》，頁 1-6。

¹⁰⁹ 夏濟安選編，夏濟安、張愛玲譯：《美國散文選（上集）》，頁 83-86。

¹¹⁰ 此書雖名為「上集」，但不知為何「下集」一直沒有出版。反倒是今日世界出版社於 1972 年 5 月出版了夏濟安編譯的《名家散文選讀》第一卷（同年 11 月出版第二卷）。該卷由《美國散文選（上集）》改編，刪去張譯的愛默森〈梭羅〉，並改以英漢對照的方式呈現。艾辛在〈美國文學的精華：介紹「名家散文選讀」第一卷〉（30）中，除了說明選文的特色與意義（強調美國早期文學的重要）之外，對身為譯介者的夏氏特別致意：「編譯這部選集的，是對美國文學有深入研究的學人夏濟安先生。夏先生是著名的文學批評家、翻譯高手，所以這本選集，無論選材和文字，都有很高的水準。在選集中，夏先生還寫了一篇深入淺出的序文，對美國文學，作了概括的介紹。每個作家的作品前面，又有作者生平和作品的簡介，對於讀者也很有幫助。」

¹¹¹ 單德興：〈在冷戰的年代——英華煥發的譯者余光中〉，《翻譯家余光中》（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 年），頁 74。

余光中與林以亮翻譯的詩作將近八成，撰寫的作家介紹將近九成。然而排名時卻是張愛玲領銜，雖然她「其實只譯了八首詩（愛默森五首，梭羅三首），並撰寫兩人的生平與著作介紹」，¹¹² 而且其中三首愛默森的詩來自先前的翻譯。亦即，張愛玲並未為《美國詩選》花太多時間與心力，卻在這本具有代表性的詩選中排名第一。¹¹³ 總之，此書由林以亮統籌兼翻譯（包括處理版權事宜），居功厥偉，內容則以余光中貢獻最多，思果在〈介紹「美國詩選」〉一文中也舉兩人的譯詩為範例，並肯定作者簡介與註釋等附文本對讀者「大有益處」，忠實反映了此書的情況。¹¹⁴

筆者在討論《今日世界》對於美國文學的再現一文中，針對思果此文曾有底下說法：「此文雖然謙稱為『介紹』，而且篇幅短小，但在品評上頗見功力，絕非應酬文字或吹捧文章，而是在看似平易的文字中，傳達了思果對於翻譯的看法，並且以回顧與前瞻的眼光，以及文學史與翻譯史的洞見，提出了大膽而正確的評斷」。¹¹⁵ 然而，儘管思果恰如其分地肯定了林以亮與余光中，但對其他譯者（「其餘幾位譯者也是今日的名作家」）只是一筆帶過，不僅在篇首出版資料付之闕如，即使封面的書影也不見任何人名。換言之，在通篇

¹¹² 單德興：〈在冷戰的年代——英華煥發的譯者余光中〉，《翻譯家余光中》，頁 73。

¹¹³ 有關《美國詩選》的討論，參閱單德興：〈在冷戰的年代——英華煥發的譯者余光中〉，《翻譯家余光中》，頁 69-77。

¹¹⁴ 思果：〈介紹「美國詩選」〉，《今日世界》，第 241 期（1962 年 4 月 1 日），頁 24。

¹¹⁵ 單德興：〈冷戰·文學·傳播——《今日世界》與美國文學在華文世界的傳播〉，收入王安琪、張上冠編：《文化傳承：文學與語言——袁鶴翔講座教授八秩晉五榮退紀念文集》，頁 70。

書評中，排名領銜的張愛玲完全不見蹤影。如果說《美國詩選》在譯者的排名上未符合比例原則，過分放大了張愛玲，那麼思果的書評則肯定此書的意義以及兩位主要譯者的貢獻，對其他譯者則隻字未提。

如果說前兩書是對「譯者張愛玲」的「呈現過度」，那麼薩滿義有關張愛玲在《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Seven Modern American Novelists*）中的貢獻則為「呈現不足」（underrepresentation）。¹¹⁶ 此書為俄康納（William Van O'Connor）編選，評介美國具有代表性的七位現代小說家。書中各篇原為明尼蘇達大學美國作家小冊（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amphlets on American Writers），此一系列始於1959年，編輯為佛斯特（Richard Foster）、戴德（Allen Tate）、恩格（Leonard Unger）與華倫，總共出版上百位美國作家的評介，今日世界出版社曾翻譯不少本。四位編輯中，戴德與華倫都是著名的新批評家，而且有中文評介與翻譯。¹¹⁷ 華倫與人合編的

¹¹⁶ 薩滿義：〈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今日世界》，第372期，頁36。

¹¹⁷ 以介紹新批評聞名的顏元叔為例，他的長文〈新批評學派的文學理論與方法〉，1969年1月至3月連載於《幼獅文藝》，後來收入《文學的玄思》，參閱顏元叔：〈新批評學派的文學理論與方法〉，《文學的玄思》（臺北：驚聲，1970年），頁105-61。戴德（顏譯為「特地」）與華倫名列「大家公認的新批評學派的核心」六人，其中戴德名列貢獻最大的三人（其他兩人為藍孫〔J. C. Ransom〕與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華倫與翁特斯（Ivor Winters）與布雷克謀（R. P. Blackmur）次之。有關兩人的介紹參閱顏元叔：〈新批評學派的文學理論與方法〉，《文學的玄思》，頁135-144，154-157。林以亮選編的《美國文學批評選》是當時重要的新批評翻譯文集，收錄的十四篇文章包括張愛玲翻譯華倫的〈海明威論〉與余光中翻譯戴德的〈詩的三型〉（“The Three Types of Poetry”），可分別參閱張

《文學入門》（*An Approach to Literature*, 1936〔與 Cleanth Brooks 和 John Thibaut Purser 合編〕）、《了解詩歌》（*Understanding Poetry*, 1938〔與 Cleanth Brooks 合編〕）《了解小說》（*Understanding Fiction*, 1943〔與 Cleanth Brooks 合編〕）等書，為新批評的文學教科書，於 1960 年代後期引進臺灣，大幅改變了外文／英文系的課程、教材與教法。就當時的學術風氣與文化政治而言，相較於歷史悠久的英國文學，要在國際上推廣美國文學，除了翻譯文學相關作品之外，推介重視作品本身的自足完整、不管其歷史環境與作家背景的新批評，會是較方便有效之道。¹¹⁸

四位合譯者中，林以亮居住香港，張愛玲、於梨華都是移居美國的華人作家，葉珊則是來自臺灣的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比較文學博士生。¹¹⁹ 書評的封面書影上方兩行為「編選者俄康納」，「翻譯者：林以亮等」，下方兩行為出版者與售價。為了彰顯此書的重要，文中引用林以亮提供的「幕後新聞」，透露原先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研究並兼教學的夏濟安

愛玲譯：〈海明威論〉，收入林以亮編：《美國文學批評選》（香港：今日世界社，1961 年），頁 148-169，以及余光中譯：〈詩的三型〉，收入林以亮編：《美國文學批評選》，頁 88-105。張譯〈海明威論〉並先於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1956 年 11 月第 1 卷第 3 期發表，文長二十四頁，並且排為第一篇。參閱張愛玲譯：〈海明威論〉，《文學雜誌》，第 1 卷第 3 期（1956 年 11 月 20 日），頁 4-27。

¹¹⁸ 新批評在臺灣盛行，一度幾乎被視為外文系文學批評的代名詞，證明了其成功，直到 1980 年代才逐漸退潮，為各種新興的文學與文化理論所取代，而其所強調的細讀已內化為文學研究的基本功。

¹¹⁹ 林以亮、於梨華、張愛玲、葉珊譯：《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67）。該書書脊為「今日世界出版」，版權頁則為「今日世界出版社」，並註明「公元一九七六民國五十六年五月初版」。

「一口答應」翻譯全書，不幸九天後因病猝逝，引為憾事。全書包括編選者撰寫的長序以及有關七位小說家的評論，張愛玲翻譯了四篇，佔全書一半：〈序〉、〈辛克萊·路易士〉、〈歐涅斯·海明威〉與〈湯麥斯·吳爾甫〉，其中只有海明威是她翻譯過的作家。¹²⁰ 書評中把此書定位為「七位大小說家的作品的總評。它介紹他們的身世，遠不如評介他們的作品來得詳盡」，提到是「由七位美國新批評派的批評家執筆的，他們每個人都是當今批評界的重量人物，都寫過份量極重的批評文字」，並舉撰寫〈歐涅斯·海明威〉一文的菲立蒲·楊（Philip Young）為例。

¹²⁰ 張愛玲翻譯的三位作家為〈辛克萊·路易士〉（“Sinclair Lewis”，作者 Mark Schorer，此冊原為該系列編號 27，1963 年出版）、〈歐涅斯·海明威〉（Philip Young, No. 1, 1959）與〈湯麥斯·吳爾甫〉（“Thomas Wolfe” by C. Hugh Holman, No. 6, 1960）。其他依次為葉珊翻譯的兩篇（〈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 by William Van O’Connor, No. 3, 1959〕與〈拿撒奈·韋斯特〉〔“Nathanael West” by Stanley Edgar Hyman, No. 21, 1962〕），林以亮翻譯的一篇（〈斯葛特·費滋傑羅〉〔“F. Scott Fitzgerald” by Charles E. Shain, No. 15, 1961〕），以及於梨華翻譯的一篇（〈伊德絲·華頓〉〔“Edith Wharton” by Louis Auchincloss, No. 12, 1961〕）。於梨華先前曾翻譯華頓的小說〈羅馬熱〉（“Roman Fever”），刊登於 1965 年 3 月號《皇冠》雜誌。她翻譯的〈伊德絲·華頓〉也於《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出版次月，自 1967 年 6 月 3 至 11 日連載於《聯合報》副刊第 9 版。林以亮曾為喬志高（高克毅）翻譯的費滋傑羅名著《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撰寫〈介紹《大亨小傳》〉。多年後楊牧（葉珊）在〈翻譯的事——從香港開始〉提到，他就是應有「翻譯先生（Mr. Translation）」（2）之稱的林以亮之邀，正式開始從事翻譯，並對林以亮語多推崇。有關明尼蘇達大學美國作家小冊相關資訊，可參閱 <https://www.upress.umn.edu/about-us/history-and-fact-sheet-folder/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history>。

眾所周知，翻譯特定作家的評論時，譯者除了文字上的理解之外，攸關作家與作品的背景知識也是重要條件，其挑戰迥異於翻譯文學作品。張愛玲一人翻譯四篇，為她所合譯之作中份量最多的一本。書評中提到四位譯者中，除了葉珊「不太為東南亞的讀者知道，其他三位都是文壇上久享盛名的作家。他們不但從事創作……在翻譯方面也都有卓越的表現」，接著略述他們的譯作，其中「張愛玲不僅譯詩，還譯過《愛默生〔森〕選集》和海明威的《老人與海》……」。¹²¹ 評介的重點放在文學評論，包括詢問讀者雖然可能讀過這些小說，但可知其「意義」、「所要探討的問題」？作者的「新技巧」、「新的表現方式」目的何在？作者對於人生的「觀照（Vision）」為何？諸如此類嚴肅的問題。文中也點出「批評家的責任即在幫助讀者接近作家，認識他們的思想」。而此書的中譯者與書評者也有意藉由翻譯與評論，幫助中文讀者接近這七位現代美國作家，認識他們的作品與思想。原書出版於 1964 年，厚達 316 頁的中譯本於 1967 年出版，書評也在同一年刊登，由此可見美新處宣揚美國文學面向之廣（擴及文學評論）、反應之速（原書出版三年便出現中譯）、力道之強（邀請知名人士翻譯）、態度之積極以及效率之高超。¹²²

或許因為篇幅限制，書評除了約略提到譯者的資歷之外，甚少著墨於譯文，即使提到有關海明威一篇是評論者專書《海明威論》的濃縮，原書「被認為是能充份表現新批評精神的一本作家評傳」，

¹²¹ 薩滿義：〈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今日世界》，第 372 期，頁 36。

¹²² 薩滿義：〈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今日世界》，第 372 期，頁 36。美新處的文學相關譯作以小說最多，其他有戲劇、散文、詩歌、評論、文學史等，相關書目詳見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翻譯與脈絡》修訂版，頁 147-157。

或者提到編者俄康納的序言「精簡、生動和深入」，是「一篇精彩之至的談小說的文字」，¹²³ 並且引用了中譯，卻只專注於文意，而未指出將這兩篇費心逐譯成中文的正是張愛玲。以致全文中最顯眼的是負責聯繫但只譯了一篇的林以亮，而不是譯了大約半本的張愛玲（有些類似《美國詩選》裡余光中的遭遇），由其他評介對她的「呈現過度」淪為此處的「呈現不足」。

（五）譯者評論

《今日世界》創刊之初刊登了兩篇唐文冰（宋淇另一筆名）討論翻譯的文章〈論翻譯之難〉與〈論翻譯之重要〉。¹²⁴ 然而由前文可知，在有關翻譯的評論或譯作的評介中，還是以原作者與作品為主，對譯者往往一筆帶過，甚至略而不提。在所有評論文章中，最以譯者為主體的，當屬身兼學者與譯者的劉紹銘。他為該社翻譯的幾部猶太裔美國作家的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集，開華文世界風氣之先。¹²⁵ 他的〈《老人與海》兩種中譯本〉評論的是張愛玲與余光中的譯本，以譯文為中心，以譯者為主體。此文有港、臺兩個版本，港版因受《今日世界》篇幅之限，刪除所有英文例證，只以中文呈現，講述要點；臺版刊登於《幼獅文藝》，舉中英文例證對照，說明論點，較為詳細。¹²⁶ 這一方面印證了當時港、臺之間藝文關係的

¹²³ 薩滿義：〈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今日世界》，第372期，頁36。

¹²⁴ 分別刊登於1952年4月15日第3期（頁18-19）與1952年6月15日第7期（頁22-23）。

¹²⁵ 參閱單德興：〈寂寞翻譯事：劉紹銘訪談錄〉，《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臺北：允晨，2014年），頁273-275。

¹²⁶ 劉紹銘：〈「老人與海」兩種中譯本〉，《今日世界》，第486期（1972年6月16日），頁29；也刊登於《幼獅文藝》，第224期（1972年8

密切，不少作家與學者遊走兩地，尋求發表的機會，另一方面也凸顯了《今日世界》的編輯方針與讀者設定。

劉紹銘的出發點是針對以不同文類聞名的兩位作家——張愛玲是小說家，余光中是詩人——探討他們在翻譯小說《老人與海》時，誰的譯作較為恰切。此事原本難以定論，加上他撰寫此文時與兩位譯者都已熟識，故寫得低調而委婉。¹²⁷ 劉文指出小說家張愛玲的翻譯使用白話，詩人余光中的翻譯則文白夾雜，後者雖有精簡扼要等優點，但在翻譯海明威的文體時未必完全貼切。結論表示在翻譯小說時，難以斷言詩人或小說家較佔優勢，但卻肯定譯詩須由詩人著手較為妥當。劉雖肯定詩人譯詩，卻未提出任何證據。然而他身為該社譯者，而且與編輯戴天為臺大外文系的舊識，了解該社的作業方式與出版品——當然包括具代表性的《美國詩選》——此說法當意有所指，並非無的放矢。¹²⁸

(六) 新聞報導

《今日世界》有關張愛玲的最後一則訊息出現於第 353 期（1966 年 12 月 1 日）封底裡的「圖畫世界」，該刊封面封底內外均為良好紙質，印刷精美。如何在有限篇幅以軟性方式呈現美國文明進步的訊息，可看出編輯之用心所在，因此每一頁都仔細評估，充分利

月），頁 10-21。當時《幼獅文藝》主編為瘧弦。

¹²⁷ 他曾協助安排張愛玲於 1966 年前往美國大學擔任駐校作家（詳下文），也曾為余光中 1971 年出版的中詩英文自譯詩集 *Acres of Barbed Wire*（《滿田的鐵絲網》）撰寫英文序言“Acres of Barbed Wire: An Appreciation”。

¹²⁸ 有關劉文的討論，參閱單德興：〈冷戰・文學・傳播——《今日世界》與美國文學在華文世界的傳播〉，收入王安琪、張上冠編：《文化傳承：文學與語言——袁鶴翔講座教授八秩晉五榮退紀念文集》，頁 72-74。

用，位置的安排、篇幅的長短、文字的內容都透露出其相對的重要性。相較於白紙黑字的內文，封底裡的「圖畫世界」以彩色圖片與精簡文字，醒目且簡要地提供有利於美國形象的訊息。

該期「圖畫世界」刊載了四則消息：環球小姐中之友愛小姐范娜寶遠東行，美國金援香港中文大學興建學生生活中心，張愛玲應美國邁亞密大學聘任教職，以及香港永安公司舉行美國商品展覽。這四則消息有意展現美國與香港的多元關係，其中兩則涉及香港和美國的大學，顯示對文教的重視。有關張愛玲的報導更帶有文化交流的意味，全文如下：「香港作家張愛玲最近應美國邁亞密大學之聘擔任教職（其職銜為 *Writer-in-Residence*）。圖內自左起為：邁亞密大學政治系亞洲問題專家貝格萊教授；張愛玲女士；東亞語文系主任周翔初教授；校長謝里佛博士。」



圖三、第 353 期《今日世界》有關張愛玲的報導（右下）

這段文字簡短，需佐以相關背景資訊，方能了解詳情。張愛玲於 1966 年 9 月中旬前往俄亥俄州牛津鎮邁亞密大學（Miami University in Oxford, Ohio）擔任「駐校作家」（Writer-in-Residence），至次年 5 月，前後七個半月。¹²⁹《今日世界》的報導出現於 12 月初，旨在強調雙方的文化交流，以及美國大學的兼容並蓄。其實，張愛玲在香港停留與寫作的時間有限，1955 年移居美國，1960 年入籍，因此以「香港作家」稱呼這位自中國大陸離散到香港、然後二度離散到美國的作家，顯然有意強調香港對張愛玲的重要意義，強化美國與香港、甚至亞洲之間的連結。

張愛玲之所以會到該校，係出於劉紹銘的協助。志在寫作的張愛玲赴美後工作不穩定，經濟情況欠佳。曾在歷史悠久的邁亞密大學（創立於 1809 年）任教的劉紹銘，聯絡昔日上司貝格萊（John Badgley），貝氏告知該校 1920 年代曾有「駐校藝術家」（artist-in-residence）的前例，並說服校方邀請張愛玲前來。張愛玲寄資料申請，獲得此職位，於 1966 年 9 月到任，同時照顧身患重病的夫婿賴雅。《今日世界》報導的便是此一訊息，拍照的場合顯然十分正式，但未註明消息或照片來源。

儘管該報導傳遞的訊息相當正面，然而實際情況卻有很大的落差。簡言之，張愛玲的心思專注於寫作，教學與演講在她的計畫之外。由於她個性不喜交際，深居簡出，在為數有限的社交場合顯得格格不入（包括校長宴請時遲到多時且沉默寡言）。美國大學駐校作家慣例舉行演講，但她在學生面前表現未符期待，也未接受學校建議投稿著名期刊。加上生活作息之故，更沒接受建議固定到

¹²⁹ 此則報導捨較常見的「邁阿密」，而將 Miami 譯為「邁亞密」，音譯較不準確，卻可能帶有「邁向亞洲密切關係」的意涵。

辦公室。此外，她覺得校內有人對她不友善。在諸多不適應的情況下，便由夏志清協助，以英譯《海上花列傳》的計畫，申請到麻薩諸塞州賴德克里夫女子學院（Radcliffe College）的獨立研究獎助金（Fellowship Grant for Independent Study），於次年4月離開。

總之，張愛玲前往該校是出於劉紹銘的熱心聯絡，校方對久未招聘的駐校作家也有相當的期許，並未看到美新處的介入（雖說申請時想必會提到與美新處的合作關係）。因此，《今日世界》的報導可視為美新處對此事的關注，但並未達到專文報導的程度，所傳遞的訊息雖然有限，但積極正面的效應符合該刊的宗旨。只不過事過境遷，從相關資料看來，張愛玲在邁亞密大學那段駐校作家的日子，於賓主雙方的期待都有相當的落差。¹³⁰

四、結語：以文字創作為家的離散文人

在張愛玲三次停留香港期間，以第二次最具體多產。當時適值美國與蘇聯對峙的冷戰局勢，美新處的主要目標在於執行圍堵戰略下的文化外交政策，以優渥的待遇與靈活的手法提倡美方的軟實力，譯介美國文學與文化不遺餘力。中英文俱佳的張愛玲自上海流離到香港，亟需謀生，雙方一拍即合。透過美新處旗下的出版社與雜誌社，不僅張愛玲的譯作陸續出版，塑造出「譯者張愛玲」的形象，並且藉由小說《秧歌》在《今日世界》連載，以及陸續出版中、英文單行本，延伸既有的小說家形象，進軍國際文壇，成功移民美國。因此，雙方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各得所值，形式上雖是委託，

¹³⁰ 劉紹銘的〈落難才女張愛玲〉對此事始末有詳細描述；張愛玲給夏志清的書信也提到當時的情形，參閱夏志清編註：《張愛玲給我的信件》，頁70，71，74；亦可參閱張惠苑編：《張愛玲年譜》，頁149-162。

實質關係則屬合作。美方重視張愛玲的才華，提供資源與管道；張愛玲則善加運用機緣，努力發揮，並與居中關鍵人物林以亮、麥卡錫結為終生好友。

張愛玲研究如今已成為華文文學中的顯學，研究者各自為「張學」提供不同的拼圖。本文聚焦於她創作與生命中位居關鍵的第二個香港時期，從美新處旗下《今日世界》的另類角度切入，探討這份當時流傳最廣的華文雜誌如何再現張愛玲。由上文可知，相對於出版社所呈現的「譯者張愛玲」，《今日世界》雜誌中的張愛玲形象更為多元，主要通過連載與書評／介紹。藉由連載《秧歌》賡續了張愛玲的小說家形象，雖為美新處委託之作，卻也是張愛玲原本就進行的寫作計畫。即使在該刊的脈絡下更強化其反共色彩，卻也在如此鮮明的對照下，更襯托出該作品的文學性與藝術性，不致如許許多的反共與政治小說，因時空環境與意識形態的變遷，淪為昨日黃花。在這段時期創作的《赤地之戀》雖未能同樣連載，但出版不久《今日世界》便有書評，並給予高度肯定。以上是該刊所呈現的「小說家張愛玲」。

其他刊出的評論與介紹則聚焦於張愛玲的獨譯與合譯之作。出版社雖以優渥的酬勞聘請港、臺兩地作家與學者，並以優質的譯作享譽文化界與教育界，然而《今日世界》的評論中對譯者的地位與角色依然維持傳統的看法，相關書評與介紹重點聚焦於原作者，旨在引介美國文學與文化，對職司翻譯要務的譯者著墨不多，甚至隻字不提。至於討論其合譯之作的書評，甚少提及各自的分工，並出現呈現過度或不足的現象，甚至發生他人冒名以張愛玲的譯者序充當介紹之不當作法。唯一例外為劉紹銘比較《老人與海》的兩位譯者（張愛玲與余光中）之文，凸顯了譯作的特色與譯者的主體性。

至於「香港作家」張愛玲於美國大學「擔任教職」的報導，雖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宣效果，但從後來相關資料得知，與實際情況有相當的落差。

以後見之明重新省視當時的情景，根據《今日世界》上有關張愛玲的具體文本與報導，參酌其生平、文獻資料與相關研究，更可看出一位作家身處大時代的動亂中，自上海離散到香港、再到美國，憑藉著個人的雙語能力、創作才華與文學理想，不僅奮力求生，並努力邁向理想。陳建忠以「流亡」與「知識分子」來形容由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國的張愛玲。筆者以為，若以薩依德（Edward W. Said）與哈金有關流亡、離散、移居、寫作等觀點來體察，則張愛玲有如薩依德在〈作家與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The Public Role of Writers and Intellectuals”）一文中所言，「身為知識分子的作家，其特殊的象徵角色在於見證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進而賦予那份經驗一個公共屬性，永遠銘刻於全球論述的議程裡」（“the special symbolic role of the writer as an intellectual testifying to a country’s or region’s experience, thereby giving that experience a public identity forever inscribed in the global discursive agenda.”）¹³¹ 在冷戰時期美蘇對抗的國際局勢下，張愛玲以一己的翻譯與創作，見證了當時一群港、臺雙語作家與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並將那段歷史銘刻於全球論述的議程中，其格局不僅不限於已逝的冷戰年代，也不限於目前眾人熟知的華文文學範疇。

質言之，張愛玲的處境更像哈金筆下「在他鄉寫作」的作家，或如其英文書名的直譯「移居作家」（the writer as migrant），因為

¹³¹ Edward W. Said, “The Public Role of Writers and Intellectuals,” *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 2004), p. 127.

她的「他鄉」就地理而言，既有初度離散、移居的香港，也有二度離散、移居的美國，而張愛玲全集由她僅短暫造訪一回的臺灣的皇冠出版社出版，作家本人並被寫入具有代表性的臺灣文學史，¹³²更落實了「在他鄉寫作」的事實與影響。再者，就語文而言，張愛玲不自滿於華文世界既有的成就，孜孜矻矻於文學創作，尋求以非母語、他鄉的英文進軍國際文壇，於已享有盛名的華文文學圈之外開疆闢土，結果雖然未能如她所願，不免華麗與蒼涼之感，然而其堅持理想、努力奮進、寫作不懈，著實令人佩服。

回顧張愛玲的生命故事，其中的曲折起伏，許多都與她的香港經驗密切相關。無論是在香港或美國以中文或英文寫作，都是多重意義的「在他鄉寫作」。縱然她命運多舛，一生深受「家苦」、「情苦」、「財苦」、「病苦」之累，¹³³但依然衷心投入寫作，視文學創作為安身立命之道。她在 1968 年 4 月接受殷允芃訪問時表示，「只要我活著，就要不停的寫……我寫得很慢。寫的時候，全心全意的浸在裡面，像個懷胎的婦人，走到哪兒就帶到哪兒」。¹³⁴ 1989 年她年近七十時，在給至交宋淇夫婦的信中寫道：「我一天寫不出東西就一天生活沒上軌道」。¹³⁵ 這種情境有如阿多諾（Theodor Adorno）所言：「作家在文本中安家。……對不再有故鄉的人，寫

¹³² 如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91 年），頁 93-94，與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2011 年），頁 343-344，369-373。

¹³³ 簡嬪：〈謎樣女人，魔樣人生——讀《謫花》有感〉，《印刻》，第 204 期（2020 年 8 月），頁 61-62。

¹³⁴ 殷允芃：〈訪張愛玲女士〉，《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當代名人訪問錄》（臺北：志文，1971 年），頁 3。

¹³⁵ 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著，宋以朗編：《張愛玲私語錄》，頁 272。

作就成為居住／生活之地」(“In his text, the writer sets up house... For a man who no longer has a homeland, writing becomes a place to live.”)。¹³⁶ 張愛玲也因為在寫作中找到歸屬，終能「此心安處是吾鄉」，進而在文學史上贏得一席之地。

¹³⁶ Theodor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 E. F. N. Jephcott, tran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78), p.87.

附錄一：《秧歌》於《今日世界》連載之情形

日期	期數	頁碼	內容	備註 (含單行本頁碼) ¹³⁷
1954 年 1 月 1 日	44	22- 25	譚家人送譚金根之妹金花到臨村登記結婚、參與宴席。	連載版第一章至第二章，四張插圖；單行本頁 1-17，三張插圖。插圖上有簽名。 ¹³⁸
1954 年 1 月 15 日	45	22- 24	返家途中金根想念在城市工作的妻子月香，回憶探望她的經歷。月香還鄉。	連載版第二章（續）至第三章，無插圖；單行本頁 17-31，無插圖。
1954 年 2 月 1 日	46	22- 24	月香發現農村實際境況不佳，眾人粉飾太平。	連載版第三章續完，一張插圖；單行本頁 31-45，一張插圖。此張插圖無簽名。

¹³⁷ 單行本指 1954 年 7 月今日世界社出版的《秧歌》最初版本。該單行本保留了連載時的部分插圖，而後來的皇冠版則無任何插圖。

¹³⁸ 即英文簽名 YINCHAO。

日期	期數	頁碼	內容	備註 (含單行本頁碼) ¹³⁷
1954年 2月 15日	47	22- 25	月香得知更多農村現實，心生悔意。王同志來訪，夫妻擔憂被看見吃稠粥。	連載版第四章至第五章完，兩張插圖，一張有簽名（頁22），一張沒簽名（頁24）；單行本頁46-64，一張插圖（即連載版頁24之圖），但由此處可看出其實左下角有簽名（頁57）。
1954年 3月 1日	48	22- 24	王同志接待下鄉知青顧岡，安排他住在譚大娘家。王同志回憶一段感情經歷。	連載版第六章，兩張插圖，有簽名；單行本頁65-80，一張插圖，有簽名。
1954年 3月 15日	49	24- 27	王同志回憶過去。顧岡發現農村飢荒，為飢餓所苦，又不敢言。	連載版第六章（續）至第七章，三張插圖，有簽名；單行本頁80-96，兩張插圖。
1954年 4月 1日	50	22- 25	顧岡與王同志討論他的劇本創作。村民開會、練習秧歌舞。顧岡因住處屋頂漏水搬到金根家住。	連載版第七章（續）至第八章，三張插圖，有簽名；單行本頁96-114，三張插圖。

日期	期數	頁碼	內容	備註 (含單行本頁碼) ¹³⁷
1954 年 4 月 15 日	51	24- 27	顧岡偷吃東西被月香撞見。譚大娘和月香吵架。金花回娘家借錢，金根夫妻為此口角。	連載版第八章(續)至第十章完，三張插圖，有簽名；單行本頁 114-32，兩張插圖。
1954 年 5 月 1 日	52	24- 27	王同志要求村民出錢為軍屬採辦年禮，與金根起衝突。譚家做年糕、殺豬。	連載版第十一章至十二章，四張插圖，有簽名；單行本頁 133-49，四張插圖。
1954 年 5 月 15 日	53	24- 27	譚大娘一家回憶兒子被強行徵兵的過去。	第十二章續完，兩張插圖，一張無原先簽名(頁 25)；單行本頁 149-64，自本期起無插圖。
1954 年 6 月 1 日	54	24- 26	金根等村民在村子糧倉前抗議遭鎮壓，女兒阿招被踩死。金根受傷，與月香逃往山上。	第十三至十四章，兩張插圖，未見原插畫者簽名，而且畫風不同；單行本頁 165-78。
1954 年 6 月 15 日	55	24- 26	月香向金花求救被拒。金根失蹤。	第十四章(續)至十五章完，兩張插圖，無簽名，而且畫風不同；單行本頁 178-93。

日期	期數	頁碼	內容	備註 (含單行本頁碼) ¹³⁷
1954年 7月 1日	56	24- 26	糧倉失火，疑是月香所為。顧岡思考農民暴動事件，杜撰了一個劇本。村人扭秧歌、抬著年禮前去給軍屬拜年。	第十六至十七章，全文完，兩張插圖，無簽名，而且畫風不同；單行本頁194-206。

* 張力行製表，單德興增補。

附錄二：《今日世界》中張愛玲相關評論

作者	篇名	日期	期數	頁碼	備註
桑簡流	〈赤地之戀〉	1954年 11月 15日	65	11	張愛玲：《赤地之戀》（香港：天風出版社，1954）。
桑簡流	〈無頭騎士〉	1955年 1月 1日	68	26	張愛玲、方馨、湯新楣合譯：《無頭騎士》（ <i>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i> ，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55）。收錄張譯之〈無頭騎士〉。

作者	篇名	日期	期數	頁碼	備註
幸明	〈美國散文選（上集）〉	1958 年 11 月 16 日	160	20	夏濟安選編，夏濟安、張愛玲合譯：《美國散文選（上集）》（香港：今日世界社，1958）。收錄張譯之愛默森〈梭羅〉與所撰之作者介紹（原《愛默森文選》〈譯者序〉）（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62；初版為《愛默森選集》〔香港：天風出版社，1953〕）。
思果	〈介紹「美國詩選」〉	1962 年 4 月 1 日	241	24	林以亮編選，張愛玲、林以亮、余光中、邢光祖等合譯：《美國詩選》（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61）。收錄張譯之愛默森詩五首（三首出自《愛默森文選》）、梭羅詩三首，及張撰之二人介紹。

作者	篇名	日期	期數	頁碼	備註
王敬義	〈一本百讀不厭的好小說：介紹「鹿苑長春」〉 ¹³⁹	1962年 9月 16日	252	27	張愛玲譯：《鹿苑長春》（ <i>The Yearling</i> ，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62）（初版為《小鹿》〔香港：天風出版社，1953〕）。
薩滿義	〈一本需要細嚼的書——介紹「歐文小說選」〉	1963年 1月 16日	260	18	張愛玲、方馨、湯新楣合譯：《歐文小說選》（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62）。收錄張譯之〈無頭騎士〉。
黎裕漢	〈介紹「愛默森文選」：一部啟迪你的思想的好書〉	1964年 3月 1日	287	24	張愛玲譯：《愛默森文選》（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62）（初版為《愛默森選集》〔香港：天風出版社，1953〕）。

¹³⁹ 此篇目錄頁標題為〈一本百讀不厭的小說〉。此處以內頁為準。

作者	篇名	日期	期數	頁碼	備註
康俠	〈介紹一本中英對照歐文小說集：「睡谷故事」與「李伯大夢」〉	1967年 6月 16日	366	23	方馨、張愛玲合譯：《睡谷故事／李伯大夢》（ <i>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 Rip Van Winkle</i> ，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67）。中英對照。收錄張譯之〈睡谷故事〉，即前譯〈無頭騎士〉。
薩滿義	〈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	1967年 9月 16日	372	36	林以亮、於梨華、張愛玲、葉珊譯：《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67）。收錄張譯之〈序〉、〈辛克萊·路易士〉、〈歐涅斯·海明威〉與〈湯麥斯·吳爾甫〉。
劉紹銘	〈「老人與海」兩種中譯本〉	1972年 6月 16日	486	29	張愛玲譯：《老人與海》（ <i>The Old Man and the Sea</i> ，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62）（初版為范思平〔張愛玲〕譯：《老人與海》〔香港：中一出版社，1952〕）。

* 張力行製表，單德興修訂。

引用書目

一、張愛玲主要文獻

(一) 張愛玲小說連載

1. 張愛玲：〈秧歌〉，《今日世界》，第44期，1954年1月1日，頁22-25。
2. 張愛玲：〈秧歌〉，《今日世界》，第45期，1954年1月15日，頁22-24。
3. 張愛玲：〈秧歌〉，《今日世界》，第46期，1954年2月1日，頁22-24。
4. 張愛玲：〈秧歌〉，《今日世界》，第47期，1954年2月15日，頁22-25。
5. 張愛玲：〈秧歌〉，《今日世界》，第48期，1954年3月1日，頁22-24。
6. 張愛玲：〈秧歌〉，《今日世界》，第49期，1954年3月15日，頁24-27。
7. 張愛玲：〈秧歌〉，《今日世界》，第50期，1954年4月1日，頁22-25。
8. 張愛玲：〈秧歌〉，《今日世界》，第51期，1954年4月15日，頁24-27。
9. 張愛玲：〈秧歌〉，《今日世界》，第52期，1954年5月1日，頁24-27。
10. 張愛玲：〈秧歌〉，《今日世界》，第53期，1954年5月15日。

日，頁 24-27。

11. 張愛玲：〈秧歌〉，《今日世界》，第 54 期，1954 年 6 月 1 日，頁 24-26。
12. 張愛玲：〈秧歌〉，《今日世界》，第 55 期，1954 年 6 月 15 日，頁 24-26。
13. 張愛玲：〈秧歌〉，《今日世界》，第 56 期，1954 年 7 月 1 日，頁 24-26。

(二) 張愛玲相關書評與介紹 (依年代順序)

1. 桑簡流：〈赤地之戀〉，《今日世界》，第 65 期，1954 年 11 月 15 日，頁 11。
2. 桑簡流：〈無頭騎士〉，《今日世界》，第 68 期，1955 年 1 月 1 日，頁 26。
3. 幸明：〈美國散文選（上集）〉，《今日世界》，第 160 期，1958 年 11 月 16 日，頁 20。
4. 思果：〈介紹「美國詩選」〉，《今日世界》，第 241 期，1962 年 4 月 1 日，頁 24。
5. 王敬義：〈一本百讀不厭的好小說：介紹「鹿苑長春」〉，《今日世界》，第 252 期，1962 年 9 月 16 日，頁 27。
6. 薩滿義：〈一本需要細嚼的書——介紹「歐文小說選」〉，《今日世界》，第 260 期，1963 年 1 月 16 日，頁 18。
7. 黎裕漢：〈介紹「愛默森文選」：一部啟迪你的思想的好書〉，《今日世界》，第 287 期，1964 年 3 月 1 日，頁 24。
8. 康俠：〈介紹一本中英對照歐文小說集：「睡谷故事」與「李伯大夢」〉，《今日世界》，第 366 期，1967 年 6 月 16 日，

頁 23。

9. 薩滿義：〈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今日世界》，第 372 期，1967 年 9 月 16 日，頁 36。
10. 劉紹銘：〈「老人與海」兩種中譯本〉，《今日世界》，第 486 期，1972 年 6 月 16 日，頁 29。
11. 劉紹銘：〈「老人與海」兩種中譯本〉，《幼獅文藝》，第 224 期，1972 年 8 月，頁 10-21。

(三) 張愛玲小說訊息 (依年代順序)

1. 今日世界：(標題「蔣經國訪美·秧歌 張愛玲」)，《今日世界》，第 44 期，1954 年 1 月 1 日，封面。
2. 今日世界：(標題「林黛與「春天不是讀書天」·秧歌張愛玲」)，《今日世界》，第 45 期，1954 年 1 月 15 日，封面。
3. 今日世界：(標題「吳陳合演真相·秧歌(張愛玲)」)，《今日世界》，第 46 期，1954 年 2 月 1 日，封面。
4. 今日世界：(標題「秧歌 張愛玲著(今日世界叢書之九)」)，《今日世界》，第 56 期，1954 年 7 月 1 日，封底。

二、專書 / 專書論文

1.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麥田，1998 年。
2. 余光中譯：〈詩的三型〉，收入林以亮編：《美國文學批評選》，香港：今日世界社，1961 年。
3. 余斌：《張愛玲傳》，臺北：晨星，1997 年。
4. 吳邦謀：《尋覓張愛玲》，香港：商務，2020 年。
5. 宋以朗：〈《小團圓》前言〉，張愛玲著：《小團圓》，臺北：

皇冠，2009 年。

6. 宋以朗：《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年。
7. 宋以朗編，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著：《張愛玲私語錄》，臺北：皇冠，2010 年。
8. 宋淇：〈私語張愛玲〉，收入蔡鳳儀編：《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紀念文集》，臺北：皇冠，1996 年。
9. 林以亮：〈前言〉，收入歐文著，張愛玲等譯：《歐文小說選》，香港：今日世界社，1963 年。
10. 林以亮：〈附錄：關於〈李伯大夢〉〉，收入歐文著，張愛玲等譯：《歐文小說選》，香港：今日世界社，1955 年。
11. 林以亮：〈介紹《大亨小傳》〉，收入費滋傑羅著，喬志高譯：《大亨小傳》，香港：今日世界社，1974 年。
12. 林以亮編，張愛玲等譯：《美國詩選》，香港：今日世界社，1963 年。
13. 林以亮編：《美國文學批評選》，香港：今日世界社，1961 年。
14. 林以亮編，林以亮等譯：《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67 年。
15. 林以亮、於梨華、張愛玲、葉珊（譯）：《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今日世界社，1967 年。
16. 林以亮：〈介紹《戰地春夢》的新譯〉，海明威著，湯新楣譯：《戰地春夢》，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0 年。
17. 哈金著，明迪譯：《在他鄉寫作》（*The Writer as Migrant*），臺北：聯經，2010 年。
18. 夏志清：〈張愛玲〉，收入夏濟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

-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
19. 夏志清編註：《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臺北：聯合文學，2013年。
 20. 夏濟安選編，夏濟安、張愛玲譯：《美國散文選（上集）》，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58年。
 21. 高全之：《張愛玲學》，臺北：麥田，2011年。
 22. 殷允芄：《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當代名人訪問錄》，臺北：志文，1971年。
 23. 陳子善：《張愛玲叢考》，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年。
 24.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2011年。
 25. 陳建忠：《島嶼風聲：冷戰氛圍下的臺灣文學及其外》，新北市：南十字星，2018年。
 26. 梁秉鈞：〈張愛玲與香港〉，劉紹銘、梁秉鈞、許子東編：《再讀張愛玲》，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
 27. 張愛玲：《秧歌》，香港：今日世界社，1954年。
 28. 張愛玲：《秧歌》，臺北：皇冠，1955年。
 29. 張愛玲：《秧歌》，張愛玲百歲誕辰紀念全新增訂版，臺北：皇冠，2020年。
 30. 張愛玲：《惘然記》，臺北：皇冠，1983年。
 31. 張愛玲：《張看》，臺北：皇冠，1976年。
 32. 張愛玲：《愛默森文選》，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62年。
 33. 張愛玲：〈愛默森的生平與著作〉，林以亮編，張愛玲等譯：《美國詩選》，香港：今日世界社，1963年。
 34. 張愛玲：《愛默森選集》，1992典藏版初版，臺北：皇冠，1999年。
 35. 張愛玲譯，范道倫（Mark Van Doren）編選：《愛默森文選》（*The*

- Portable Emerson*），1953 年；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81 年。
36. 張愛玲譯：〈海明威論〉，收入林以亮編：《美國文學批評選》，香港：今日世界社，1961 年。
 37. 張愛玲譯：〈論《戰地春夢》〉，收入海明威著，湯新楣譯：《戰地春夢》，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0 年。
 38. 張愛玲譯：〈無頭騎士〉，歐文著，張愛玲等譯：《無頭騎士》，香港：今日世界社，1955 年。
 39. 張愛玲譯：〈無頭騎士〉，歐文著，張愛玲等譯：《歐文小說選》，香港：今日世界社，1963 年。
 40. 張愛玲、方馨、湯新楣合譯：《歐文小說選》，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62 年。
 41. 張愛玲譯：〈睡谷故事〉，歐文著，張愛玲、方馨譯：《睡谷故事·李伯大夢》，香港：今日世界社，1971 年。
 42. 張惠苑編：《張愛玲年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年。
 43. 單德興：《翻譯與脈絡》修訂版，臺北：書林，2009 年。
 44. 單德興：《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臺北：允晨，2014 年。
 45. 單德興：〈冷戰·文學·傳播——《今日世界》與美國文學在華文世界的傳播〉，收入王安琪、張上冠編：《文化傳承：文學與語言——袁鶴翔講座教授八秩晉五榮退紀念文集》，臺北：書林，2019 年。
 46. 單德興：《翻譯家余光中》，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 年。
 47. 莊信正：《張愛玲來信箋註》，臺北：印刻，2008 年。
 48.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91 年。
 49. 楊牧：《譯事》，香港：天地圖書，2007 年。

50. 鄭樹森編選：《張愛玲的世界》，臺北：允晨，2004年。
51. 鄭樹森：《從諾貝爾到張愛玲》，臺北：印刻，2007年。
52. 劉再復：《再讀張愛玲》，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
53. 顏元叔：《文學的玄思》，臺北：驚聲，1970年。
54. 羅秀美：〈張愛玲的「翻譯」文學：試論她如何以「翻譯」傳播並接受他者／自我的華文小說〉，收入林幸謙編：《張愛玲：傳奇·性別·系譜》，臺北：聯經，2012年。
55. 蘇偉貞：《孤島張愛玲——追蹤張愛玲香港時期（1952～1955）小說》，臺北：三民，2002年。
56. Adorno, Theodor. 1978.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 E. F. N. Jephcott, tran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57. Chang, Eileen. 1955. *The Rice-Sprout Song*.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58. Chang, Eileen. 1963. *The Rice-Sprout Song*. Hong Kong: Dragonfly Books.
59. Chang, Eileen. 1966. *The Rice-Sprout Song*. Hong Kong: Dragonfly Books.
60. Chang, Eileen. 1998. *The Rice-Sprout Song*.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
61. Lefevere, André.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62. Said, Edward W. 2004. "The Public Role of Writers and Intellectuals," *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
63. Tay, William. 2000. "Colonialism, the Cold War Era, and Marginal

Space: The Existential Condition of Five Decades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in Pang-yuan Chi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a Modern Century: A Critical Survey*, Michelle Yeh tran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 Pr.

64. Wang, David Der-wei. 1998. “Foreword,” in Eileen Chang, *The Rice-Sprout Song*.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

三、期刊論文

1. 王梅香：〈不為人知的張愛玲：美國新聞處譯書計畫下的《秧歌》與《赤地之戀》〉，《歐美研究》，第 45 卷第 1 期，2015 年 3 月，頁 73-137。
2. 賴慈芸、張思婷：〈追本溯源——一個進行中的翻譯書目計畫〉，《編譯論叢》，第 4 卷 2 期，2011 年，頁 151-180。

四、報章雜誌

1. 今日世界：〈向親愛的讀者致敬〉，《今日世界》，第 44 期，1954 年 1 月 1 日，頁 1。
2. 今日世界：〈蔣經國訪美觀感〉，《今日世界》，第 44 期，1954 年 1 月 1 日，頁 27。
3. 今日世界：〈偉大的同情與友愛〉，《今日世界》，第 45 期，1954 年 1 月 15 日，頁 1。
4. 今日世界：〈從一天看兩個世界〉，《今日世界》，第 46 期，1954 年 2 月 1 日，頁 1。
5. 今日世界：〈圖畫世界〉，《今日世界》，第 353 期，1966

- 年 12 月，無頁碼。
6. 今日世界：〈本刊啟事〉，《今日世界》，第 597 期，1980 年 11 月，頁 27。
 7. 今日世界：〈寫在最後一期「今日世界」〉，《今日世界》，第 598 期，1980 年 12 月，頁 2。
 8. 艾辛：〈美國文學的精華：介紹「名家散文選讀」第一卷〉，《今日世界》，第 503 期，1973 年 3 月 1 日，頁 30。
 9. 李景開攝：〈吳陳拳術合演真相〉，《今日世界》第 46 期，1954 年 2 月 15 日，頁 5。
 10. 李麗華：〈李麗華自傳〉，《今日世界》，第 46 期，1954 年 2 月 1 日，頁 8-9。
 11. 周芬伶著，謝毓祥譯：〈張愛玲夢魘——她的六封家書〉，《印刻》，第 11 期，2004 年 7 月，頁 59-68。
 12. 於梨華譯，〈羅馬熱〉（“Roman Fever” by Edith Wharton），《皇冠》133 期，1965 年 3 月，頁 26-37。
 13. 於梨華譯，〈伊德絲·華頓〉（“Edith Wharton” by Louis Auchincloss），《聯合報》副刊，1967 年 6 月 3 日至 11 日，9 版。
 14. 金炳興：〈談「戰地春夢」〉，《今日世界》，第 488 期，1972 年 7 月 16 日，頁 36。
 15. 張愛玲譯：〈海明威論〉，《文學雜誌》，第 1 卷第 3 期，1956 年 11 月，頁 4-27。
 16. 陳子善：〈與大海續「緣」——張愛玲譯《冰洋四傑》（部分）的發現〉，《明報月刊》，第 657 期，2020 年 9 月，頁 60-68。
 17. 陳紀滢：〈《荻村傳》的翻譯始末——兼記張愛玲〉，《聯

合文學》，第 29 期，1987 年 3 月，頁 92-94。

18. 單德興：〈美國即世界？——《今日世界》的緣起緣滅〉，《攝影之聲》，第 20 期，2017 年，頁 18-25。
19. 鄭馨：〈林黛與「春天不是讀書天」〉，《今日世界》，第 45 期，1954 年 1 月 15 日，頁 10。
20. 簡嬪：〈謎樣女人，魔樣人生——讀《謫花》有感〉，《印刻》，第 204 期，2020 年 8 月，頁 60-63。

五、通訊訪談

1. 王梅香：臉書通訊，2020 年 8 月 27 日。
2. 李如桐：電話訪談，香港，2004 年 10 月 22 日。
3. 張同：電話訪談，香港，2004 年 10 月 22-23 日。
4. 鄭樹森：致作者電郵，2020 年 8 月 12 日。

六、網路資料

1. 《蘋果日報》：<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
2.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istory: <https://www.upress.umn.edu/>